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24

2009年4月13日

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中）

— 我讀李零

中國稅務學會 張木生

第二章 現狀史學與史學現狀的反省

四、是歷史怪圈還是思維怪圈

（一）《河殤》一罵一捧之外的觀察角度

1988年，一部歷史文化題材的“反思”片《河殤》問世，讓人們耳目一新，一時間“攪得周天寒徹”，似乎中國總是錯過歷史給予的公平機遇，一再發生選擇性錯誤，後悔藥吃得腸子都青了。李零當時的答記者問對總結上述的“五種形態說”和“亞細亞生產方式說”，中國歷史研究的三大主題：分期、停滯與萌芽說更有通俗意義。

現在所說的“反思”，主題是“反傳統文化”。它是同“弘揚傳統文化”唱對臺戲。有人講，“反思”是引人向前，“弘揚”

是拉人退後。這種話題，一百多年前，大家就熱衷過。但我認為並非除了這樣一捧一罵，我們就別無選擇了。李零分析：

現在兩種風，從文化氣候上講，還是罵佔上風。“四人幫”垮臺後，大家痛感中國落後，這個情緒一直是壓倒一切的。近年來，很多寫歷史文化問題的作品都是以此為基調。只不過用影視手段這種大眾媒介來表現這個基調，這還是第一次。

直率地講，我們對“弘揚”說並不贊同。現在很多人講孔子、講中國文化特性，以及民間藝術的發掘等等，都帶有一種“假古董氣”，但我認為，《河》片反映的情緒是個更值得批評的現象。很多人都說要反省中國歷史，但認真看一下，恐怕還是以膚淺的“比較”居多，是順著“文革”結束後的那種情緒在做慣性運動，很少對自己習慣的認識方法和思維角度進行反省。也就是說，沒有受到懷疑的恰恰是懷疑本身。

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既有陸路也有水路，據考證曾經到達羅馬。古人曾把羅馬稱為大秦，可能是因為秦國很強大的對應。中國古代的航海也很牛，鄭和下西洋，大船二百隻，同行三萬人，可謂船堅炮利。近年來外國人有一本書，提出鄭和發現了好望角也發現了新大陸。書名是《1421 — 中國發現世界》，¹ 是說鄭和比哥倫布發現美洲要早 70 年，當然這還是推論，沒有確實的史料證明。這樣講並不是為自己壯膽，也不是用“我曾經闊過”掩蓋中國近代落後了。一講歷史文化，大家不可能不帶感情，但用感情看歷史文化是一件很壞的事情。“四人幫”垮臺之後，我們中國人又一次睜眼看世界，心情肯定沉重，不要說去歐美，改革開放初過境香港，也驚得目瞪口呆。現在不同了，現在的小孩從美國回到北京、上海，可以說出美國太破，中國真闊。現代化的許多問題，過去、現在、

¹ 鮑家慶譯，孟西士著：《1421 — 中國發現世界》，臺灣遠流出版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將來還會反復出現這種“神話”。

說起神話，《河》片在當時就是一個樣板，它反映了“古、今、中、外”當時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東西方文明表面上是相互隔絕的，我不知你在球西，你不知我在球東。似乎不在一個競賽場地。但實際上古代甚至遠古時期就互有交往。現在的體質人類學家，多數人都認為全世界的現代人類，十萬年前由非洲現代智人走向全世界，種群數量只有六萬人，他們消滅了歐洲的尼安特人，也間接消滅了中國最早的三峽人、元謀人、藍田人、北京周口店人。現代考古學也證明，大約在舊石器時期，現在居住人類的地方，那時已有早期人類生存。只是那時的文化傳播的速度比現在慢得多。近代以降，全球或早或晚都捲入同一競賽場地。從前我們在農業文明中對人類有很大貢獻，李約瑟的《中國古代科技史》說明，外國發達國家受惠於中國文明太多太多，而且不僅僅是科技。中國有大一統的專制傳統，而歐洲文藝復興，首先是拋棄歐洲四分五裂小國林立的傳統，大一統的專制帝國，是先進制度的代表，這是歐洲人的睜眼看世界。但近代中國卻丟了“老大”，《河》片特別強調的是在航海問題上，歷史給了“公平機會”，但我們卻坐失良機，一蹶不振，以至於今。李零對這種心態一語中的：

現在講歷史，有許多人是以 50 年代的“常識”為材料，按 80 年代的情緒進行編寫，搞出一些誤解。拿“閉塞”和“開放”來說事兒，現在有一種神話，就是海洋使人相聯，陸地使人隔絕，我們吃虧就吃虧在不航海，是個“閉塞”的文明。《河》片也把西方文明叫“海洋文明”，叫“蔚藍色的文明”，正好與我們這個“黃土地”形成對照。其實，事情哪有這麼簡單。西方的農業文明也是內陸文明，他們的農耕文化是源於西亞，從東南歐分兩線向北、向西傳播，走中歐的那條線特別發達，也是在黃土地帶上發展起來。他們航海範圍也很有限，一直是在地中海這個“小澡盆”裡打轉轉。其文化傳播半徑無論在陸地上還是在海洋上都不比我們大。我們古

代也一直航海，鄭和以前就航海。古代航海都是沿海岸線順邊溜，或從小島跳躍，但我們這邊是個“大池子”（夾在三個大洲間），英文叫 Pacific Basin。它太大了，不但不能使人相聯，還使人隔絕。

在這個“大池子”裡，美拉尼西亞和玻利尼西亞的居民是最古老的航海民族，但地理大發現時，他們的發展程度也最低。《河》片把黃河流域文化領先於長江流域文化的發展看作“內陸文明”打敗“海洋文明”，認為此事“埋伏下”我們民族“日後衰敗的命運”，而且從“河姆渡”一下就跑到了“深圳”，這都是一些錯誤印象。²

近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有一種輸不起的心理，你看中國辦奧運會，本來挺好的一件事，非辦得像世界末日似的。大筆投銀子，有錢能使鬼推磨，推出了鳥蛋、鳥巢、鳥腿還不夠，還要辦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綠色的、科技的、人文的、爭光的、愛國的、勇攀高峰的、發揮制度優勢的、有特色、高水平的、中國人百年期盼的奧運會，這是中華民族的百年企盼，直到最後才知道安全奧運最重要，把一場體育比賽的奧運辦成鬧運，奧運成了關口，千軍萬馬過鬼門關。好容易熬到奧運會開幕式，宏大氣派，世界第一，振奮人心作用不容否定。但展現的中國元素，傳統文化多被知識界、文化界視為苟合取容。主題是“天人合一”，其實“天人合一”恰恰是西方傳統。天是宗教，西方傳統文化才是政教合一。中國傳統文化是政教分離，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國家在宗教之上。幾千解放軍戰士扮演的祭也，深衣、漢衣冠，燒香磕頭，口頌“禮之用，和為貴”，十分滑稽，萬分荒誕，孔教大興，真能萬邦歸化，柔遠能邇？別做夢了。至於“秦人擊缶”更是笑話。缶是古代的陶罐，擊缶就是敲盆敲碗。曾侯乙墓出土的方形青銅器，中間放缶，用以裝食物，方形青銅器是古代的冰箱，缶四面放冰。幾千人表演的是秦人敲冰箱。我們的大國氣派，舉國體制，恰恰是西方人詬病集權專制所長，集中國力辦大事。當英國人說，“我

² 李零：〈歷史怪圈〉，《放虎歸山》第2~7頁。

們不可能辦出中國式氣派的奧運，不能隨便花納稅人的錢，沒有可無限透支的財力”時，你就明白什麼叫求榮得辱，欲益反損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真是春秋大夢！西方人批評我們“金牌總數第一，國民體質下降”，也不是空穴來風，真讓國人氣短。

有好事者作過統計，中國每塊奧運金牌的投入是 75 億元，金、銀、銅每塊獎牌的投入平均 35 億元。難怪李零說：“這就像職業運動員為了那些寶貴的一釐米、一秒鐘，同如雲的強手搏鬥，跟生命的極限較勁，流血流汗，渾身傷殘，無論捧懷而還還是抱恨而歸，都免不了大哭一場，讓我們這些觀眾也跟著掉淚。可是話說回來，運動員既奉健身為宗旨，為全民樹立榜樣，結果拖個病身子回來，卻也不無諷刺。大家都說體育的精神是‘貴在參與’，然而真正的體育精神在哪兒？我看還是那些每天早上，花間林下，抻胳膊踹腿，搖脖子晃腦袋，從來也不知冠軍為何物的人當中。”³

幾乎所有辦過奧運會的國家筆者都去過，就是後發型的韓國也沒有我們這麼折騰，你越把自己當回事，鬼子越不把你當回事。中國病得不輕，病名可以稱之為現代化綜合症。這一百年來，很多人以為研究中國歷史就剩下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為什麼長期停滯，實際上這個世界除了“八國聯軍”，大家都長期停滯。就是“八國聯軍”也曾經“長期停滯”，和一萬多年的農耕文明比，哪個國家非“停滯”。二是中國為什麼沒有自行進入資本主義。用歐洲幾百年的一把尺子，稱量天下，倒霉看反面，幻聽幻覺的如此可笑。為什麼中國不四分五裂而總是大一統，為什麼尊儒術而不搞統一宗教？為什麼中國沒有西方式的民主與科學？其實西方的現代民主制和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制度一點關係都沒有，人種不是那個人種，文明不是那個文明，在一萬年的人類農耕文明中，大一統的專制制度比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制度先進、文明，李零的分析我們將在後面闡述。吃肉，草原民族比歐

³ 李零：《放虎歸山》〈代序〉。

洲人吃得多，航海的最早的民族，發展的程度也最低，現代的海軍起源於北歐的海盜。和其他航海民族不同，他是國家組織的，國王就是海盜的頭子，是西方人海上搶，陸上搶文化的延伸。而且，搶劫的規模愈來愈大，之後才有工業文明。工業文明的發生很複雜，但有一點，與農業文明的發生不同，是從一點出現，然後傳遍全球。中國沒有自行進入“資本主義”，起碼這個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上百個國家）都沒有自行進入資本主義，就連我們今天看來最先進的國家，美國、德國、法國、日本，都沒有自行進入資本主義。如果一百多個國家的學者都像中國學者這樣提問題，結論是，恐中國社會並沒有“長期停滯”，倒是我們這些人的心智“長期停滯”了。

（二）東方主義和殖民歷史觀

由於學界對後殖民理論認識上的種種混亂，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如下說法：薩伊德＝反西方主義＝提倡民族主義，或後殖民理論就是西方理論等……對於前一種說法，有必要予以某種澄清。奇怪的是後一種說法，它將後殖民理論一股腦算在西方的賬上，為想像中的“西方”臉上貼金，恰恰印證了說話者對“西方”理論霸權的臣服，其實，西方文化的衛道士（如歐美學界那些抵制薩伊德影響的人）還不見得會買賬。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後殖民理論的方法論跟傳統的學術史寫作有什麼不同，也許可以這樣來表述：由於不滿足於就事論事地對學術史或學科史（年代、思潮、機構、人物、著作等）作“客觀性”的描述，後殖民理論主張將“學科行為”作為思想史的有機部分來研究，通過考查學術傳統的來龍去脈，去檢討“學科行為”的歷史作為和意識形態功能。毫無疑問，這裡所說的功能也包括現代學科本身對知識“客觀性”的訴求。也就是說，在後殖民理論影響下的當代學術史和學科史，對傳統思想史寫作提出了空前的挑戰和一系列新的問題。

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一書之所以被有些人譯作《東方學》，正是為了突出此書的學科史背景。薩伊德本人則更強調學術史的意識形態功能，因此，他使用 Orientalism（東方主義）去批評

Oriental learning (東方學) 在生產西方中心(特別是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方面所扮演的特殊歷史角色。《東方主義》一書研究的學科對象是現代歐洲語文學(philology), 其中包括漢學(sinology), 伊斯蘭學(Islamic studies) 等其他東方學分科。這些學科的誕生與歐洲人在歐洲以外的殖民歷史的關係, 正是作者的關注重點。

薩伊德對“東方主義”研究的特點恰恰在於, 他把問題落實在東西方之間交往的歷史之中, 把這個現代史的結症充分地具體化, 因此更有效地解答哲學家們關心的一個問題: 怎樣重新認識“學科行為”中的認識論機制?

西方的文化霸權不難批評, 難的是如何認清和解開人文研究、社會科學的學科本身的歷史包袱, 尤其是當這些學科訴求於“客觀性”的時候。幾乎和薩伊德同時起步的文化人類學家費邊Johannes Fabian在其《時間與非我: 人類學如何構建其對象?》一書中, 對西方人類學的時間觀、歷史觀以及客觀訴求, 提出了類似的挑戰。他認為, 人類學以及民俗學從一開始, 就建立在對時間的進化論式的構想上。這種構想把“非我”事先放置在歷史長河的“原始”那一端, 以確立現代“我類”這一端的文明之優越。人類學對“非我”在時間上排拒(temporal distancing)造成時間的空間化(spatialization of time), 體現在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跑到別的地方, 從事職業化的“田野調查”(fieldwork)。去“傳統”社會做“田野”的大前提是把“他們”作為“我們”人類的過去來研究, 而不是關注“他們”存在的現實意義。“他們”的現實狀況必須翻譯成“我們”的過去, 才獲得其真實內涵。它解釋了為什麼經過幾百年的殖民經驗和與非西方世界的交往, 以及這種交往所帶來的全球性的後果, 人類學家還能夠假設別處的文化和社會結構一成不變, 仍然不包含他們自己的歷史在其中(比如西方人類學家代代相傳, 百去不厭的摩洛哥和印尼巴厘島)。這種把時間(進化論意義的)空間化的做法, 為學術的“客觀性”提供了認識論基礎, 使人

類學、民俗學獲得了自己知識上的權威。⁴

李零說：

討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在引導人們反封建、爭民主上是有意義的，但發展到一種民族自卑的地步，似乎就走偏了。現代一些西方文化人類學家認為，各類文化都有自己的生長、存在的條件和價值，無優劣可言。

文化當然有發展程度上的差別，問題是如何縮小這些差別。古與今，中與外，在大家心裡老是擺不平。

李零從來反對掙扎在崇洋與排外兩種心態之間，既自卑又自大，或者甚至是交替的自卑與自大，想“忍”再“狠”，重新當“老大”，幹嗎我們就不能直面西方，直面中國，改變一下這種心態呢？中國近代以來，挫折感極大，所以“競賽意識”極強，老想用大目標給自己打氣。龍應臺曾說過臺灣的現代化過程，“窮急了，就把門坎砍了當柴燒”。這種低目標的追求和當“老大”的想法看似矛盾，卻並不矛盾，有一道普照之光，光從西方來，就是現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唯美國馬首是瞻，這是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性格，一種百年來的失衡心態。罵起來，一罵祖宗，二罵山川，三罵傳統，這些都是歷史給定的條件，任何發展中的國家，都不能用白板去接受現代文明。弘揚起來，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國民黨不如維新派，維新派不如老佛爺，老佛爺是滿族，“非我同類其心必異”，往後看，明朝是農民起義得天下，不正宗，南宋是一派亡國之音，程朱陸王后的南宋災難更深重，重新塑造的假孔子，死孔子，那才是中國的正宗，不但可以救中國，而且可以救世界，外國科技好，中國道德高。這不，連儒學社會主義都弘揚出來了。中國人受“差距感”的壓力太大，歷史的包袱太沉重。

一百多年的現代化，我們經過太多的幻聽幻覺，神州陸沉亡國滅種經過了，超英趕美，一天等於20年的“大躍進”經過了，機遇、

⁴ 劉禾：〈理論與歷史，東方與西方〉，《讀書》1996年第8期，第3~7頁。

挑戰、開除球籍的改革開放經過了，我們已經建成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的“世界工廠”。中國的現代化是被揍出來的現代化，不但世界上的先搶者揍過我們，後搶者德、日也揍過我們。敵人是最好的老師，試想一下如果當年的中日甲午海戰，勝利者不是日本而是中國，中國也成了東亞的後搶者，二戰後期吃原子彈就不是日本人。王子與貧兒，乞丐與龍王比寶，中國總處在求榮得辱，欲益反損，無所逃死的境地。中國經歷了那麼多，剛剛過去的 20 世紀，是人類最悲慘的世紀，前 50 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禍起蕭牆，本來中國招誰惹誰了，但中國被殺的人最多，而西方在統計上不把我們當人。後 50 年是原子彈恐怖下的和平，美國也好，蘇聯也好，都曾想過用原子彈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全世界的病灶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中國現在的許多事搞不好，有遠因，有近因，有內因，有外因，更重要的責任是在我們自己，它和中國的傳統關係越來越小，與現代化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中國人應該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歷史觀，全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都應該梳理自己近代化以來的文化歷史觀。

李零強調，我並不是說歷史與現實沒關係。我這樣講是要強調歷史學與現實的真正關係。美國歷史學家黃仁宇說，最初，他感到困惑的是，抗戰後國民黨為什麼一下子就垮了臺，他想弄明白這件事，但後來發現，這至少要“退後”二三百年的時間，才能弄清，所以後來才搞明史。他強調“向後退”，是因為只有“向後退”，“視角”才能擴大，看到的畫面才比較宏闊，才能找到現實的準確坐標點，才能看清未來的方向。他說，人的眼界都受到生命尺度的限制，這個尺度只有一百年，太小，逼得太近，反而看不清。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也可以說歷史學是為了解決“超越生命”。“超越生命”也是貫穿於哲學、文學、藝術和宗教的一種主題。

無論是主張棄絕傳統，還是弘揚傳統，都似乎與自外於世界資本主義總體系的心態有關係，棄絕，好像是不棄絕就不能加入，就有被“開除”的危險。弘揚傳統，表面是擺脫西方的話語霸權，

過去我比你闊，現在，傳統進一步開發，我還會比你闊，天道輪回，其參照系離不開現代化，儒的林子大了去了，什麼鳥都有，什麼歌都會唱，唱來唱去離不開現代化的宿疾。

“主體文化”與“文化主體”是兩個概念，我們現在有些人還想讓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當主體文化，那是不可能的。但中國也不可能以“白板”去接受西方文化。這個主體是歷史給定的，你可以改變它，但不能棄絕它。更何況，現在的這個主體也並不都是由傳統的東西組成。

中國近百年來的文化是一個混合體，本土的東西和外來的東西都經過了歷史的選擇。這種相互適應和整合的過程並不全是被動的，也包含了許多人為的和自覺的因素。

對傳統文化，我們現在是“倒羈看反面”。但現在日本和“四小龍”卻被看作“弘揚”傳統文化的典範，原因就在他們“發了”。日本戰敗後，一直追隨美國，日本和四小龍的發家史一點都不古代化，而是特現代化，追隨“美帝”發了韓戰、越戰之財，和“傳統”沒什麼關係。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利弊”要看得複雜一點，不要以一時的可用與否斷定其優劣。所以，既用不著“一闊臉就變”，也用不著“一窮氣就短”。

對傳統如何認識，今天還做得很差，很多是想當然和意氣用事。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多數人恨傳統，那是從骨子裡恨，從根上就恨，改革開放是最硬的道理，西方的東西，好的壞的一古腦都往中國招，引進市場經濟，推行民主政治，恨不得中國一天就成為歐羅巴美麗尖。但那時候，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異軍突起，真正解決問題的農村包產到戶，在許多方面卻是利用了傳統機制，如一定程度上的財產私有權，包括改變土地使用制度，以及農業的家庭經營，農民選擇生產項目和行業的較多自由，某種水平的農村市場機制，以及商品經營等等。它們都是在近百年的歷史中存在的。傳統無恙，傳統有用。但是，這種傳統已是近百年來中國文化的混合體，本土

的東西和外來的東西相互適應和整合，有許多是幾百年的老傳統原來沒有的新元素。中國不同於歐洲，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買賣，自耕農是生產的主體，幾千年古已有之。但並不是一包產就靈，幾千年的私有制走下來，一條走不通的死路。為何改革開放後一包就靈？如果沒有解放後農村大規模基礎設施的建設，幾萬座水庫的修建，土、肥、水、種的現代化改革，化肥、良種、農膜、農藥的使用，根本就不可能“一包就靈”。探索傳統與現代的實際關係，寫出非“虛擬語氣”的中國現代史的變化，沒有什麼“胡麻、胡麻開”的怪絕奇招，只能對中國人面對現代化挑戰，東試西試隨機耦合具體分析。

抬君權打神權，抬人權打君權，結果是君權、神權、人權在西方折衷。而中國有君權可反，無封建可反，反專制求民主得專制，專制反不掉，是因為專制與民主都有相通性，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民主也好，專制也好，哪個行得通？實際是一種成本的計算。發達國家可將成本轉移給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只能自己承擔成本，還要替別人承擔成本，所以專制特難反。難反也要反，所以，過程會長一點。

現在的右派是唯美國馬首是瞻，愛美國沒商量，動不動就是“今夜我是美國人”。投懷送抱，不管你要不要我，反正槍打不走，彈打不飛，我和你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而左派動不動就是重新當老大的強國夢，“中國模式”獨步天下呼之欲出，其實都是春秋大夢。中國再特色也改變不了當今世界的格局，格局決定一切。蘇聯解體，多想融入西方世界，十年過去，熱臉貼了冷屁股，逼你撿起槍，繼續玩後冷戰。中國給西方打工，中國製造實質是由中國製造，就算按購買力標準計算中國 GDP 世界第二，肉大身沉，佛大泥多，缺少骨骼，缺少牙齒。一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人家損失的是虛擬經濟，而我們損失的是實體經濟。更別說不少中國人，剛過兩天好日子就找不到北，夢想自己大國崛起，在亞洲“搞亞帝國主義”。在美歐眼裡，俄羅斯的分量重於中國，這世界的遊戲規

則和格局百年未變，今後幾十年也改不了。當年毛澤東反蘇聯的修正主義，反什麼？反赫魯曉夫的“三和一少”、“全民國家、全民黨”，想和美國“和平共處”。但中國能搞 30 年的改革開放，沒有毛澤東晚年設計的中美交好，抵制蘇聯，能有接下來的改革開放嗎？西方能向中國開放嗎？格局和遊戲規則都沒變。這是全世界的大道理，硬道理。中國在這樣的格局中，自己要什麼？自己是什麼？自己舍什麼？需要有清醒的認識。美歐仍欺負我們，對霸權，當然要反抗，不能反抗也應該反對。對國內，仍要過市場關，民主關，仍有既得利益的強勢群體，仍需要大量的資本家。但對官產學煤、款腕星，等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日益尖銳的矛盾，用市場機制激勵人，用民主政治團結人，首先是團結弱勢群體，這是世界普照之光下的大格局決定的，摸路的日子長得很，危險隨時存在。

近年來，有一本暢銷書《大國空巢》，該書作者一反 20 世紀 80 年代的罵祖宗，罵中國人口多且劣，一肚子人窮志短，馬瘦毛長，賴瓜籽多，窮漢兒多的心態。認為中國人口政策劍走偏峰，現在東南地區已出現了局部的民工荒，男女比例失調，未實現現代化已逼近人口老齡化。的確，真理只要多走一步就成謬誤。這麼個大彎兒是怎麼轉過來的，我一直在想。現在回過頭來讀讀李零當時從歷史角度談人口問題，挺有益處。

人口問題學術性很強，今天我國還沒有全面的和系統的研究。這裡，我只想講四點：第一，中國歷史上人口達到四、五億，這是清代的事，但是傳統經濟發展與人口增長是一正相關關係，清代的幾點成就，沒有人口的增長，可以說一條也做不到，這是一個基本事實；第二，在工業化的問題上，則有一個人口適度規模和人口機遇的問題，這點在 18 世紀的中國和西歐是很不一樣的，但人口多少，誰能負責呢？都賴“帝王將相”呢，還是“人民群眾”？第三，有人想當然地以為，中國歷史上人口少些就好了，如與清代相比，明代人口較少，只有一兩億人，但相應地，兩湖、兩廣、西南、東北、臺灣以至西北，

便沒有清代那樣的開發，當時經濟重心是偏於東部運河一線，如果這樣的中國，遇到 19 世紀以後的外力入侵，會有什麼結局？第四，有人說中國歷史給我們只是一大堆素質低劣的人口，這並不對，歷史上的中國，除人口，也有資金，有資源，有發明，並不是生活在馬爾薩斯所謂的“生存線”之下，這是國際漢學界早已論定的問題。

其實，傳統農耕文明社會，其文明程度發展的高低，只有一個標準，就是一個國家範圍內能養活人口的多少。中國在傳統文明條件下，人口能達到四五億人，那是文明程度極高的表現。

20 世紀 80 年代初，我們也年輕過，我們也走紅過。當時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的杜潤生主任經常帶我們發展組的年輕人到中南海彙報基層調研的成果，用杜老的話說，為中央的決策先用你們年輕人投石問路。那時中央的一線領導人也確有需求，常把他們主持的會稱作自由論壇。我記得有一次就是向萬里同志彙報人口問題。當時的發展組主張，計劃生育要科學化，提出的策略是一對育齡夫妻，“見男就收，見女就放”，只要生女孩子，幾個都成，直到生了男孩子，就不許再生了。人口有自然平衡規律，好像還給出了數學模型，其結果是，新生兒男女比例 1 比 1.16。如果實行這樣的政策，第一，男女比例不會像今天這樣失調，女孩子略多一點社會安全。第二，人口總量不會比今天增太多，而且也可延緩人口老齡化過早到來。萬里是同意這一策略的，可惜當時中央的領導集體沒有採納。現在的青年人很難再有我們那時的機遇，現在的中央領導都博士化了，本身就是專家。但有一點沒變，越是專家越找不到北，這不是調侃，牛頓不知道大狗小貓只需一個出入的洞口，愛因斯坦外出散步經常找不到家門，“百項全能”，少之又少，哪怕天才如毛澤東。

至於今天中國的人口問題的癥結何在，當年大罵祖宗，大罵山川，大罵人口的人也該好好想想。當時就是短視，荷蘭、日本的人均資源，人口密度條件都大不如中國，近 30 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確實是“運來山河齊努力”，我們收穫最多的是“人口紅

利”，近兩億農民工棄農務工，正遇上西方國家的產業大轉移，這是改革開放初期任何人都未設計到的。但形勢比人強，它正在為解決人口問題摸索著自己的道路，所以，有些事並不像初看起來那麼可悲。控制人口和積極尋求經濟出路是一回事，怨天尤人，罵祖宗，以為今天的一切都已為歷史所命中註定則是另一回事。

中國現在所碰到的“文化反思”問題，從積極的方面講，有警醒國民的意義，但從消極方面講則是心態失衡，幻聽，幻視。這種問題絕不是一次性的問題，而是從上一個世紀就已提出，今後也還會反復碰到的問題，這本身已表明，“千載難逢的良機”，乃是一個聳人聽聞的說法。

中國現在碰到的“文化反思”問題是個帶有全球性的問題。這樣大的問題，難免會令人有“俟河之清”的慨嘆。你要沒有耐心學會正面看問題，直面西方，直面中國，那也就別怪自己碰上了歷史宿命的“怪圈”。

（三）文明和文化

讓我先從“文明”與“文化”這兩個概念入手，它們常常相互關聯卻從來不是完全等值的。在歐洲語言中，這兩個詞從拉丁語語源上有明顯區別。“文化”來自鄉間，起源於農民的世界，它的本意是指培植耕作自然作物，這一含義至今尚有殘留；而“文明”一詞則起源於城市，來自公民的都市世界。後者的現代用法可以溯源到啟蒙運動，它是啟蒙運動一個最主要的主題；前者的現代用法的起源要稍晚一點，應追溯到原型浪漫主義或有時所稱的反啟蒙主義文獻。

它們第一次產生了尖銳的衝突。有關的權威論述見於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該書1918年6月在德國出版，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個月。如今有必要重新回顧他的觀點。

“世界歷史的形態學”。他是最早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人之一。“托勒密式的歷史體系是對當代西歐人眼中的歷史圖景的最恰當的命名，在這一體系中，諸多偉大的文化都被設定在環繞著我們

西方文化的軌道上運行，我們則是假想的世界萬事萬物的中心。”他寫道，“我想，在本書中提出的體系是歷史領域的哥白尼式的新發現。在此一體系中，歐洲文化在與之相對的其他文化面前沒有任何優越地位可言。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中國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它們各自都是動態存在的世界，從分量上看，它們在歷史的一般圖景中的地位同西方文化是一樣的。”

至於文明，斯賓格勒視之為文化的對立面——更確切地說，是文化的僵屍。是文化“這個奇妙的勝衰交替的有機形式”走向滅亡的時刻。“文明”是開化的人群所能達到的最為外在和非自然的狀態。它們是一個終結，是緊跟在生命之後的死亡，是擴張之後的僵硬，是取代了大地母親的理智時代和用石頭堆砌而成的呆板的城市……它們是不可更改的終結，但在內在必然性的驅使下人們已經一次次地走到這一時刻。”

這裡所說的由活生生的文化走向垂死的文明的徵兆，表現在每一方面，斯賓格勒認為首先是西方的新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不折不扣的文明。西方的命運正不可避免地陷入帝國主義這種形式中……擴張主義（expansionism）是一種災難，兇惡而頑強緊抓著、強使著、耗盡著已進入城市階段的人類所餘存的精力與品性。”

工業化也一樣，在經歷了輝煌的開端後，業已成為一種災難——“機器工業的經濟強迫工人服從，它對企業家的力量也毫不遜色。雙方都變成了奴隸，誰也不是機器的主人，它正第一次積聚起自己神秘的力量……西方的工業改變了其他文化傳統的走向。經濟生活的潮流沖向煤炭和各種原生資源的廣大產地。自然日益枯竭。地球為浮士德式的思維作出了犧牲。”但是，在這個文明中，還有一種比機器更強大的力量。“金錢對這種智慧的力量猛攻也是力大無比。工業像鄉民一樣被束縛在土地上，它有它固定的場所，和從大地湧出的原料。只有高高在上的金融活動是全然自由的、無從捉摸的。1789年以來，銀行和交易所已經從空前增長的工業的信用需

求中發展成一種力量，並且它們將成為唯一的力量。”

但是金錢的勝利也是不能持久的。“金錢已走到了成功的盡頭，最後的衝突——金錢和鮮血的衝突——已迫在眉睫，在此衝突中，文明將確立其最終的形式。愷撒主義的到來打破了金錢的專制和它的政治武器：民主政治……能推翻並廢棄金錢的只有鮮血。”這將是西方文化的最後的歷史階段。斯賓格勒的著作實際上第一次對法西斯主義的到來進行了清醒的預言。

你看這幅圖景，與今天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多像！歷史只是在更惡的力量下，以更糟糕的形式重演。

70年之後，時光倒流，歷史倒讀，隨著蘇聯集團自己整垮自己，福山的著作必然取得世界性的成功，歷史終結的話題共識對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感到歡欣鼓舞。與福山不同的塞繆爾·亨廷頓，他是越戰期間約翰遜政府反騷亂專家，現任哈佛戰略研究所所長。一年之後，1993年夏天，在一個綱領性的標題——《文明的終結？》下，亨廷頓對時代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診斷。亨廷頓把他的觀點擴充為一本書並在美國引起鉅大反響。冷戰的結束，蘇聯的徹底失敗，幾乎排除了歷史向資本主義之外發展的其他可能性，確實導致全球範圍的意識形態衝突的停歇，但這並不意味著作為對抗性進程的歷史的終結。簡而言之，“衝突主要不再基於意識形態或經濟利益。人類之間的最大的分界線和衝突的首要原因將是文化……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

亨廷頓所謂的文明是“把人類同其他物種區別開來的最高等級的人類文化群體和最廣範圍的人類文化認同”。換句話說，斯賓格勒的“文明”一詞所包含的輕蔑涵義消失了：亨廷頓的文明只不過是高級的文化形式，他一共列舉了八種文明：西方文明、中國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很值得懷疑，它真是一種文明嗎？——非洲文明。文明間必定會發生衝突，因為它們自身包含了政治實體間更為深刻持久的價值衝突，而非一般差異。區分各種文明的首要標準是宗教。

亨廷頓宣稱，“在現代社會中宗教可能是激勵和調動人民的核心力量。”那麼，文明之間那條最危險的分界線在何處？首要的深淵橫亘於亨廷頓所謂的“西方與非西方”中間。因為只有西方文明才真正認識到“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憲政主義、人權、平等、自由、法制、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的價值，而其他文明卻努力抵抗它們的傳播。

這是一種極可能從觀念發展到武力的衝突，因為文明不僅只是信仰體系，而且還是權力體系。亨廷頓認為，現在正處於軍事、經濟和政治的非凡巔峰的西方，能夠在聯合國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名義下處理這個地球上發生的一切事務。正如他坦率指出的：“‘世界統一體’這個詞本身已經變為一個委婉的集體名詞，它賦予反映美國和西方勢力利益的行為以全球合法性。”但是西方必須打起精神對付來自非西方文明的日益增長的挑戰，這些文明並不同西方分享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價值觀。但是亨廷頓認為，在別處還有許多威脅，其中最危險的是所謂儒家文明與西方的敵人伊斯蘭的聯合。美國被迫繼續扮演憲兵的角色，而它自己正面臨西班牙裔或非白人多數到下世紀中葉時頗為麻煩的前景，它必須把他們同化或使之消亡。簡言之，亨廷頓總結道，斯賓格勒本來應當明白，“歷史沒有終結。世界不是一體。文明結合和分割人類……信仰與家庭、鮮血與信念，人們賴之以相互認同，人們也將為之戰鬥和死亡。”

一年之後，福山出版了第二本著作《信任》。它涉及的範圍與亨廷頓多有重合，在此書開始時福山自己十分明確地提到這點。他寫道：“亨廷頓顯然是對的，從現在起文化的差異將日益突出，所有的社會在處理國內外事務時，都將不得不更多地關注文化問題。”但是，亨廷頓否認歷史的制度性終結、預言文明間衝突之處，福山指出卻正是（作為消弭文化差異的過程中的制度化的起源……作為今日社會間重要變化的殘餘資源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的全球性勝利之時。因為戰爭不會再發生在信奉共同民主準則的發達工業化國家間，國際競爭的主戰場已轉移到經濟的和平競爭領域。福山揭示

出，每個國家都存在特有的文化遺產，如美國的宗派性的新教、日本的封建繼承制（feudal adoption）、德國的行會傳統、中國的儒家倫理等等，它們各自有利或不利於自然形成的社會性。

文明和文化的斯賓格勒式的對立，在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德國傳播甚廣，如今卻已不再居主流位置。現在，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連續性更強了，而兩者間基本的差異僅僅是地理範圍上的。對亨廷頓而言，文明具有典型的地區性——儘管不總是這樣，因為日本自身被視為一種文明（斯賓格勒在為日本歸類時同樣遇到了困難，他把現代日本社會視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看，不論三位作者有多大分歧，但他們對日本都一樣，發自內心的好評，日本特像西方，從分封制一步跨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西方人不僅特喜歡，而且總被樹為東方的榜樣。但如果沒有日本在二戰戰敗並被美國佔領呢？

亨廷頓採納了斯賓格勒對西方長遠未來的某些看法，並同樣把文明看成是不可通約的，甚至是不可滲透的統一體。堅信資本主義獲得了確定無疑的全球勝利的福山更樂觀些，他傾向於認為，文化即使不是順應於刻意進行的社會改革，也是可以隨歷史變遷而變化的。

然而，兩位作者在理論運作上也有共同之處，就是把戰略性關注從冷戰時期的經濟和政治戰場轉移到後冷戰世界中作為首要分界線的文化衝突上來。換句話說，所有該發生的事都發生了，好像一個不知困倦的資本主義鉅無霸，在幾乎全球的範圍內建立起同質的政治化的經濟統治後，又無情地向殘餘的文化異質性進發，並進而把它們併吞到其意識形態機構中去，或者作為警告系統以確保其軍事上的警覺（亨廷頓），或作為極端重要的經濟競爭的伺服機構（福山）。亨廷頓和福山在目前資本主義世界統治的範圍上持不同看法，但他們都一致對一點表示擔憂，即美國的霸權、它的無可挑戰的霸主地位正處於危險之中，危險既來自外部的競爭，也來自內部的災難（犯罪問題、種族問題和個人主義）。美國只能再次從文化領域獲得它所需要的新的社會凝聚力，以與海外的變遷格局相競爭。在每一種情況下，文化，

或文明，均被理解為從前資本主義的過去遺傳而來的信念或習慣的複合物，其獨特的黏合劑是先驗的信仰。在此，這兩位理論家再度與斯賓格勒達成共識，後者稱：“每一文化的本質都是宗教。”

在西方的政治目的中，文明和文化的新話語是佔據了很高地位的主題。另外還有一個主題，它出現的途徑是不同的。這就是“市民社會”話語。這個概念傳到馬克思手中時成為私人財產和階級不平等的競技場，它在黑格爾敘述中是國家的內在秘密。

50年之後，它的涵義倒轉了。在東歐，在蘇聯集團存在的最後幾年裡，處於對立位置的知識分子——有些一度是馬克思主義者——操起市民社會的口號，把它作為抵抗現存政體的旗幟，用所有在這種或那種意義上獨立於共產主義政體的力量——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來界定它，以有助於削弱這一政體的根基。於是，一度指明剝削和虛幻領域的批判性概念，如今變為肯定性的原則，標示著真實性和自由的空間。在新的用法中，資本主義是不言而喻的目標，而不是魔鬼。然而，“市民社會”這個術語妙就妙在，它並不直接道出其目標，而是從一大批不受壓制的行動主體口中表露出來的對高尚理想的種種言說，以及自發的組織形式。在此形式下，它又回傳給批判性社會理論本身的後續者，即如近來哈貝馬斯的使用法，他對這一概念作了帶有啟發性的調整，祛除了資產階級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內含的所有妥協性涵義，變為無可挑剔的市民社會（*zivilgesellschaft*）。

不過，當今關於市民社會最為重要的理論來自一位盎格魯——捷克社會學家伊內斯特·格爾納（Ernest Gellner），他最新的主要著作出版於1994年，名為《自由的狀況——市民社會及其敵人》。這部著作的主題是探討西方取得對蘇聯之勝利的歷史原因。他認為作為獨立於國家的一整套制度的市民社會的繁榮，植根於私有商業經濟，而這種經濟在蘇維埃的共產主義中完全是被壓抑的，因此蘇維埃的共產主義最終就不能抵禦西方在市民社會保障下的高生產率和政治自由。

格爾納明確地拒絕民主是可以替代市民社會的另一個詞彙。他的確有相當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認為自由需要的是國家的不干涉而不是必要的多數統治。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不在此處。他說：“民主模式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制度和文化在先，它不是後於民主決策的。民主，就像市場，在一個完全安排好的結構中，是得意洋洋地作出次要決定的極佳方式，但如果沒有不斷重複且不斷出錯，就不能對包含各種價值體系的總體性社會結構加以把握並進行決策。民主模式對大多數問題不適宜，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邏輯問題。並不是說用民主這種方法大多數問題不會得到很好的處理，而是如此設想本身就沒有意義。

我們的文化給予我們身份：那麼，當還沒有自我，沒有身份，沒有價值眼光或整套的價值觀——而這是使這一選擇得以完成的保證——誰來選擇我們的文化呢？

格爾納確信，在遠東，如日本或韓國，更不用說中國，社會的經濟成功，看來並不是基於有自身特色的個人主義的“西方市民社會的標準化的社會精神氣質”，而是基於“本質上保守的、整體論的、傳統的”文化。他悲觀地作出結論：“不論我們是否喜歡，那個為低效經濟帶來死訊的要命的天使也並不總是為自由服務的。”轉了一大圈，我們又回到了亨廷頓的恐懼上。^{5 6}

看了歐美最頂級思想家的奇談怪論，我們不得不重申幾個早已得出的結論：第一，資本主義的產生是國際性的，沒有幾大文明的衝突變異就沒有資本主義，幾大文明只有繼續衝突，才有資本主義的生命力；第二，先有帝國主義，後有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文明在不斷的嬗變中。老帝國主義在殖民主義中發展資本主義，新帝國主義不用通過殖民佔領資源、市場、領土、勞動力，但在永遠的戰爭

⁵ 本譯文參考了齊世榮等譯：《西方的沒落》，商務印書館1963年。

⁶ 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內涵〉，《讀書》1999年第7期，第39~46頁。

經濟中，將高科技的一超獨霸的軍火工業變成佔盡世界便宜，而不需自己流血犧牲投機、賭博的虛擬經濟，它將吸盡全世界任何民族的最後一滴血汗，寄生腐朽是它最正常的生活方式；第三，進入21世紀的歐美思想家，一點進步都沒有，他們的文化歷史觀甚至落後於1918年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文化歷史觀。帝國主義絕不是一個陳年往事，美國把自己的國家安全、全球利益建立在對國際事務的強暴干涉和窮兵黷武上，一切以他們的一己私利為轉移，他們的家事就是全世界的事，全世界的事都是他們的家事，就是他一手扶植起來的歐共體、歐元也是他佔便宜的對象，遑論亞、非、拉，更是他佔盡便宜的對象。後冷戰時期，冷槍頂著熱腦門，手榴彈專砸腳跟。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幾乎毀掉這顆星球，後冷戰的美國，他們的傲慢和自私，如果全世界沒人能制止它，仍將毀掉這個世界。

1983年在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日，李零針對西方的馬克思著作研究中把“青年馬克思”與“老年馬克思”對立起來，劃地自守，各執一端，反對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這很糟糕），反對斯大林主義（有一定的用謬誤反謬誤的解毒作用），寫過一篇〈論《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費爾巴哈〉中的唯物史觀的原始表述〉，此文沒人重視，卻非常重要。

馬克思生前多次表明，唯物史觀的首次全面闡述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它完成了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後總結，也清算了自己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義思想”。馬克思也一直認為《德》書的原稿遺失，早就交“老鼠的牙齒”批判了。李零對〈費爾巴哈〉章的三個版本進行了考據學的研究，從恩格斯發現手稿到最終版本的確定，他都下了一番功夫。

李零對《德》書中生產力、生產關係（交往關係）、生產方式、分工、所有制形式、資本主義社會（市民社會）、意識形態等為什麼都是雙重含義，對其歷史沿革中的具體環境，從黑格爾、費爾巴哈到施特勞斯、施蒂納的青年黑格爾派做了特徵描述，對唯物史觀的原貌

的恢復功不可泯。李零從版本原貌、敘述結構、概念術語、創作思路全面清理，指出馬克思用“勞動異化”批判了費爾巴哈的“真正的人道主義”的“人性異化”，用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批判費爾巴哈、施蒂納對抽象個人，“唯一的個人”的崇拜。李零還將〈費爾巴哈〉章中的唯物史觀與晚期表述形式進行了比較，包括後期恩格斯著作對唯物史觀成熟表達的比較。第一，李零第一個明確指出歷史分期（如蒙昧、野蠻、文明、古代、中世紀、近代），馬克思曾使用過的“導致一種經濟形態被另一種經濟形態所代替，由此形成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序列（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以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消滅）”。這種分期，除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消滅外，不是馬克思發明，馬克思之前就已流行，馬克思沒有提出新的分期，而是對這些分期做了必要的經濟說明，指出“所有制形式”歷史變遷的原因和結果。第二，李零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以某種理想社會的構想為內容，而是以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科學論證為內容，他的全部學說都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的歷史批判之上。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獨立組成部分，而是以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這兩大發現為基礎的理論體系本身。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作為通俗介紹可以，但嚴格講卻不夠準確。馬克思第一個發現形成於19世紀40年代，第二個發現形成於19世紀50年代。⁷

（四）早期傳教士的漢化

過去漢語學界的研究在處理耶穌會科學的傳入時，總傾向於咎責耶穌會士的工具性操作，或者感嘆於清廷之未能採用耶穌會科學。這樣的觀點假設：近代早期科學的種子，若能在中國的土壤裡得到妥善的播種，則假以時日，近代科學勢必在中國開花結

⁷ 李零：〈關於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章的說明，收入《農村·經濟·社會》第二卷，第408~417頁。

果。這種一廂情願的假設，有著兩個謬誤。首先，西歐以外各地區的近代科學之發展與傳播，皆有所依賴的當地特定的政治、制度與社會背景條件。其次，西學所涵蓋的近代早期科學，其實是一種誤導的（嚴重地說是錯誤的）第谷宇宙系統，折衷舊的托勒密地球中心論與哥白尼式的太陽中心論的一種宇宙模式。西方還處在“群拜康乾”，抑教權揚君權，建立絕對王權的迷夢之中。

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傳教事業，乃建築在一種雙重弔詭的情境之上。一方面，他們越是想要達到傳教的目的，他們就得在天文曆算等技術知識上提出“聞所未聞”的新奇項目來迎合、吸引中國的精英；而他們越是這麼做，他們就越得依賴朝廷的金援以及士紳精英的人脈網絡。但另一方面，他們越是如此依賴，他們就越得向儒學靠攏，並自我節制傳教的活動。當利瑪竇終於與明末大臣徐光啟建立鞏固的關係時，他自稱自己是洋儒生，他想傳教的渴望，常常壓制在明朝曆書中對天體運行的觀測及計算的準確，出現問題，需要一位洋技術員的層面之下。

這些耶穌會士們最關心的，倒不是如何貢獻他們的科學長技，而是如何保障他們的傳教權利。不過，他們還是必須提供對於宇宙幾何模型的持續修正以便作出更準確的天文計算與日月食的預測。他們同時必須避免提出革命性的宇宙模型，否則，他們很容易就會被當成是可疑的外國人。更重要的是，他們別無選擇地必須與中國的知識精英結盟，從而也受到宮廷的精英政治的鉗制。在“西學”的名義之下，朝廷與地方的耶穌會士協力傾注於西方文化的大量引介，內容涵蓋了中世紀的勸善寓言、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聖經的諾亞故事、第谷模式的宇宙論、歐幾里得幾何學、遙遠地區的傳奇故事、地理學與宇宙誌、炮彈製造技術、玻璃製造技術、文字代數、解剖學、光學、藥、葡萄酒以及天文儀器的製造等等。這些大量引介進來的東西，大都被當作稀奇有趣的舶來品，以助長“聞見之知”。

為了容納來自拉丁西方的龐大資訊，清初的知識精英遂發展

出一種世界主義式的儒家思想架構（cosmopolitan confucianism），作為討論西學的知識架構。到 1700 年，中國有關歐亞大陸、非洲、印度、東南亞等各地區的記載，已累積到了必須重新做整體的理解才能有效分類的地步。雖然大多數的知識精英是來自江南，但在官方或私下的文字裡，他們都肯認京師（北京）仍是政治與文化的中心。至於耶穌會士，至少在表面上，他們從來都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種世界主義式的儒學架構。

西歐絕對王權的興起，宗教改革後天主教之傳教熱潮的全球性擴散，以及希臘羅馬文明，甚至是更早之古文獻的復興。就中國而言，它們是指：繼明朝之後大清帝國的崛起與鞏固，為了清政權正當化而進行的儒家經典的重構，以及為重整先秦古籍而推動的漢代考據學之復興。⁸

西方傳教士需要“漢化”，滿族精英也需要“漢化”。諷刺的是，那些傳教的開路先鋒羅明堅、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前後相繼近一百年，他們到中國後的經歷都離不開“漢化”。在這個問題上沒什麼後悔藥好吃，用不著幻聽幻覺。中國的第一波西化，只能如此，那時還沒有英美人什麼事，也沒有工業化。中國落後於現代西化，也就一百多年，頂多二百年，二百年在六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中，對現代人是震天撼地，對歷史只是白駒過隙，俯仰之間。18 世紀，西方人到中國傳教，倍加小心謹慎，雖然中國傳統只取經不傳教，但對第一波的西風東漸，心態是開放自信。那時西方人拿得出手的東西也不多，無非是鐘錶、望遠鏡之類的奇巧東西。只有 19 世紀之後，西方才異軍突起，借助船堅炮利的赫赫武功，制高點一旦形成，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羽翼豐滿，威絕四海，才不把其他文明放在眼裡。但資本主義剛剛形成，就培養了它的批判者——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至今沒有戰勝資

⁸ 胡明輝：〈從拉丁西方到清代中國〉，《讀書》2005 年第 11 期，第 21~25 頁。

本主義，但追隨馬克思主義的反抗大潮，才使資本主義多少明白一點豁然一點收斂一點。

160年的歷史實踐對馬克思的兩大發現提出挑戰，馬克思主義沒有戰勝資本主義不是價值判斷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個地球上所有的人仍然生活在資本主義的總體系下，無人能逃脫這種命運。對待這種命運應採取何種態度？李零以雜文的形式講了二則故事，讓你苦思冥想，若有所失卻若有所是，很有啟發，出乎人情又入乎天理，讓人有大夢初醒之感。

五、學習馬克思，懷疑馬克思，超越馬克思

（一）老闆下蛋和資本家的要素價值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繼承和完善，剩餘價值論是他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基石。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價值還原、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成為生產和分配的唯一尺度。可是160年過去，馬克思的假說，任何地方也沒實現。

從前，學《資本論》，有兩個難題：

（1）為什麼酒放在酒窖裡，年頭久了，會自動升值？這裡面有什麼勞動？

（2）機器是成本，不創造價值，但牛馬的活兒值多少，肯定不止草料錢，為什麼我們不說人剝削了牛馬？

這樣的問題，現在還是問題。

老師說，這些問題嗎，那可就難說了，它好像雞生蛋還是蛋生雞，是有點講不清的……

學生打斷他的話，老師，雞也不曾生蛋，蛋也不曾生雞。

為什麼？老師問。

為什麼都是買賣，包括學校。您是老師，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現在是工人階級的一分子。工人階級就是老闆花錢僱來的人，

即僱傭勞動者，現在也叫“工薪族”，其實和母雞差不多。老闆花錢——僱人——養雞——下蛋，這是經濟學家講的 produce，不是女人家理解的“生產”。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問題，答案太簡單。蛋不是老闆下的，還是您下的嗎？

胡說八道，你還講不講馬克思主義，老師很生氣。

工人不是牛馬，理應拿回他的一份，即剩餘價值，對不對？這是馬克思講的。但這個道理根本不對。馬克思替工人打抱不平，但也不懂經濟學。他這一輩子，前後寫過三個經濟學手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最後這個手稿，就是《資本論》的草稿。他花二三十年，書越寫越厚，前提本身太脆弱，道理還是那句話，勁全白使了。學生越說越來勁兒。

胡說八道，你還有沒有良心，老師更生氣。

話要這麼講，就沒勁了。發展的問題往哪兒擺？況且，牛馬如果會說話，他們也會討公道：誰養活誰呀咱們來看一看，憑什麼餵我幾把草，種出的糧食全歸人。過去，我們說工人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但輪到講剩餘價值，您怎麼又不承認他們是牛馬了呢？您不就說，牛馬是牛馬，人是人。奴隸是人，工人是人。牛馬不是，機器不是。人有人道理，牛不懂，馬不知。誰讓這些傢伙光吃草，不說話，鼻子底下白長個嘴。這樣的標準，是人道標準，不是經濟學標準。在資本家眼裡，什麼都是生產要素，對不起。

誰投資誰受益，老闆下蛋是硬道理。

如今的學生都比老師聰明。⁹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和資本家的生產要素論，感情上，窮人選擇馬克思，現實中，人們承認發展是硬道理，承認要素分配論。庸俗經濟學講要素決定價值，現代西方經濟學講要素決定價格，價格配置資

⁹ 李零：〈硬道理和軟道理〉，《花間一壺酒》第14~16頁。

源；改革開放後，執政黨講，既要按勞分配也要要素分配，甚至要重新認識剩餘價值理論。同樣是大道理管小道理，硬道理管軟道理。

國發委研究所夏小林對全總《第六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總報告》進行分析：現在全國企業職工多數已在非公有制企業工作（58.6%），全國產業工人的主體——農民工集中在非公有制企業（69.7%）。這次調查的普通工人月平均工資為1155.88元，為全部職工月平均工資收入的84.6%。2007比2006年還下降了10.5個百分點，52.2%的農民工月工資低於1000元，私營單位工人收入水平低，是普通工人和農民工工資水平低的主要成因之一，再次顯示了古典經濟學描述的在私營工廠存在利潤與工資的衝突。而“主流”“智囊”久居廟堂之中，官產學媒精誠合作，不管工人、農民多少不爽，他們的話語權瓦釜雷鳴。比如，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全國政協財經委員就搬出新古典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大師弗里德曼的理論，認為“就勞動力要素市場而言，政府要做的是停止干預生產要素的形成，比如勞動的價格不要人為決定、保護……真正讓市場決定生產要素的價格。”“中國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蔡昉、郭松民文章）。夏小林利用全總新報進一步得出結論：“改革30年：61%職工可能參加群體事件？”¹⁰

誰罔顧你的死活，剋扣你的工資，甚至出現奴工，這都是市場經濟要求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結果。

王小魯教授2007年撰文指出：“主要由於腐敗現象導致的灰色收入”，“2005年”“沒有統計到的隱性收入達4.8萬億元”，“主要發生在佔城鎮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戶，佔全部遺漏收入的四分之三。”這和王煉利對國家統計局多年年鑒的分析相互對應。體制外統計學家王煉利指出的數據，少數富裕階層六年有15萬億元的額外消費沒有進入國家統計。著名的波士頓諮詢公司（BCC）2007年發

¹⁰ 夏小林：〈改革30年：61%職工可能參加群體事件？〉《香港傳真》No.2008~84。

佈《中國理財市場》報告稱，佔人口 0.5% 的富有家庭擁有中國 60% 以上的個人財富，擁有約 1.44 萬億美元資產，持現率達 71%，並以每年 13% 左右的速度發展。中國的富翁在全世界已排第三位。

在資本家眼裡，什麼都是生產要素，對不起。

誰投資誰受益，老闆下蛋是硬道理。

的確，在中國 5% 的富人富得流油，勤勞致富者有，但也不乏貪官豪奪，奸商巧取，貪官搭臺，奸商唱戲，先富起來的也不能總是揣著明白裝糊塗，良心揣在褲襠裡，專拿弱勢群體打鏢。

你不要認為這是什麼中國特色，也不是中國的強勢群體一方努力的結果，這也是國際大格局決定的。2008 年，百年一遇的美歐金融海嘯。人民幣升值暫停，矛頭對準了《勞動法》，新勞動法使工人的工資略有提高，大批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企業紛紛倒閉。

全球大格局決定一切。¹¹

（二）啓蒙思想的大猿猴

盧梭是“天賦人權”說的鼻祖。他的《社會契約論》是以 18 世紀流行的“自然人”說為基礎。他所謂的“人是生而自由的”，是啓蒙思潮的理想之辭。所謂“自然人”，不過是一種幻想的大猿猴，意思是原始狀態下的人本來應該是這個樣子。但可惜的是，歷史上的人從來都不是這樣，從來如此的只是，他們“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盧梭語，緊接在上“人是生而自由的”後）。

伏爾泰說，盧梭的書是反人類的書，讀了，就想四肢著地爬著走。

羅素說，希特勒是來自盧梭（相反，羅斯福和丘吉爾是出於洛克）。

然而，這卻是《人權宣言》所謂“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論基礎。

人是生而自由還是生而不自由？說起這個話題，有件事值得

¹¹ 王小魯：〈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香港傳真》No. 2007~37。另見《比較》雜誌第 31 期，中信出版社 2007 年，第 33~70 頁

回憶。

20 世紀 50 年代，“西馬”思想異端是以討論人性異化的形式而展開（可追溯到盧卡奇的《歷史和階級意識》），即以重新解讀馬克思主義原典的形式而展開（下面所說的馬克思的兩部早期著作是發表於二次大戰前，戰後才廣為人知）。用馬克思反馬克思，用早期馬克思反對晚期馬克思，這在當時是順理成章。它的傳入中國主要是 20 世紀 60 年代，基本上是在能夠接觸到灰皮書的少數人裡有影響。“文革”中，我去拜訪楊一之先生（黑格爾《邏輯學》的譯者）。他跟我說，周揚迷上了人性異化學說，把它寫進著名反修報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但毛澤東不喜歡，特意刪改周的話，加上他的話。“文革”後，很多人認為，他們飽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之苦，都是因為抹殺人性，不講人道主義。出於對“文革”的反動，王若水又舊話重提（他特別提到周的上述報告），遭到胡喬木的批判（立論酷似毛澤東的修改）。我們不難發現，當時的啓蒙，其中就有大猿猴的影子。

平心而論，大猿猴雖有鼓舞人心之效，卻毫無原典依據。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西馬”異端喜歡強調《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人性異化，說這本書才是代表馬克思學說的精髓和本義。這有當時的需要：資本主義有異化，社會主義難道沒有？其意不在原典。當時，我讀過原典，仔仔細細讀過。馬克思終其一生，老講異化，但從來不講人道主義。這不但和王若水的說法有很大出入，而且與胡喬木的說法（讓講人道主義，不讓講異化）也完全相反。馬克思的歷史觀是非道德主義。阿爾都塞的話不一定都對，但他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非人道主義”，那是千真萬確。《手稿》帶有費爾巴哈的影響，確確實實是被《德意志意識形態》否定，這不是蘇共（當然是前蘇共了）的惡意捏造。《形態》是批施蒂納。施蒂納以他叫“惟一者”的純粹個人批費爾巴哈的“抽象人”，用“存在”對抗“本質”，是無政府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先聲。這類批判對馬克思刺激很深。從 1845 年起，

他雖主張“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還是用整體概念的人反對純粹個人，同情貧苦工人階級的立場也沒有變（這是惟一可以讓人聯想到人道主義的地方），但起碼在理論上，他是放棄了費爾巴哈的“抽象人”。事實上，從《形態》起，他就再也不講“人性異化”。按他本人或恩格斯的說法，《形態》才是代表他們後來的一貫說法（阿爾都塞反對用早期馬克思反對晚期馬克思，也是尊重歷史）。

在《形態》第一章，即《費爾巴哈》章中，他明確說，把整個歷史過程“看成是‘人’的自我異化過程”，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馬克思不是人道主義者，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他喜歡講異化，經常講，到處講，也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但他後來的說法，不是人性異化，而是勞動異化，即由商品世界體現的頭足倒置，物與人，主與客，關係完全是反過來的。其典型表達是《資本論》第一章第四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在這一節的最後，他引用莎士比亞《無事煩惱》中的話作為結尾：

一個人長得漂亮是環境造成的，會寫字唸書才是天生的本領。¹²

異化演說，已成為國際公案，當年蘇聯官方意識形態，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都不能接受，這很自然。馬克思的勞動異化論——商品的拜物教——剩餘價值論一脈相承。所以，社會主義還有異化，還有剝削？毛澤東不接受，胡喬木也不接受，按照他們的邏輯，順理成章。但胡喬木、周揚、王若水各執一端，對馬克思的理解都有錯誤，錯誤面前人人平等。李零的分析不僅正確，而且可為這段公案畫上句號。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160年來在任何地方都沒真正、完全地實現過，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完全改變了，而世界資本主義總體系下的全球病灶仍是全球任何地方的普照之光。美歐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中國過去“半

¹² 李零：〈硬道理和軟道理〉，《花間一壺酒》第11~12頁。

封建、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拉美後殖民化的資本主義、所有發展中國家現行的資本主義——不管他們自己宣稱自己是什麼主義，李零對這個世界的基本形態歸納的是如此常態，如此有效：

發展、效率、剝削、壓迫、強權、侵略是硬道理，溫飽、閒暇、自由、平等、公正、和平是軟道理。軟道理打不過硬道理，硬道理管著軟道理。

硬道理是不容商量的道理，無可奈何的道理，但未必就該逆來順受。人類的不滿，千百年的抗爭，也有它正當的理由，絕不可輕言放棄。¹³

今語云，雞蛋碰石頭，找甌。但古人說，水性至柔，可以穿石。有個童話故事，道理很深刻。

兩個小熊，只有一塊餅，不知如何是好。狐狸說，好辦好辦。他把餅一掰兩半，左邊一塊大，右邊一塊小，吃虧的小熊不幹。狐狸說，好辦好辦，再分。左邊啃一口，不均；右邊啃一口，也不均。一口一口又一口，直到剩下兩小塊，再也分不出大小。於是，兩個小熊皆大歡喜，覺得狐狸才是公平的化身。

我想，幸虧小熊分的是面餅，都要，不妨多烙幾張。可如果碰上金銀珠寶大鑽石，怎麼辦？總不能砸爛搗碎，一人一堆碎渣兒。驢可夥著使，老婆不能輪著睡。所以，經濟學家講了，狐狸拿大頭，小熊拿小頭，這是我們的惟一選擇。

發展創造稀缺。

稀缺的存在，是瓜分的困境。

吃剩下的，永遠是小熊的命。¹⁴

（三）站在義和團一邊，還是站在八國聯軍一邊？

不僅經濟上如此這般，文化上也是如此這般。“主流”歡欣鼓舞：

¹³ 李零：〈硬道理和軟道理〉，《花間一壺酒》第11頁。

¹⁴ 李零：〈硬道理和軟道理〉，《花間一壺酒》第18頁。

狼來了。到了 1995 年夏天，何止是狼來了。獅子來了，還是王。可那《獅子王》的吼聲讓男女老幼觀眾都覺得頗為動聽。他們覺得獅子王的故事是那樣動人和飽含著人情味，片中的配樂是那樣迴腸盪氣，用手和電腦畫出的動物形象的表情是那樣親切、擬人化。連一本獅子王的卡通畫冊都賣到 28 元人民幣。於是，有的人把這視為是人從《獅子王》中讀出政治、經濟、美學上強者對現在各種秩序的粉飾和捍衛。有的論者讀出了王者的邏輯，嘆息那些只能吃草的鹿們對此是沒有發言權的。¹⁵ 還有的青年學生“想起了毛澤東的詞”：“糖衣炮彈”，認為這事“跟當年鴉片進中國一樣，是很令人恐怖的”。¹⁶

《獅子王》幾乎和所有的好萊塢大片一樣，一個古老而永恆的故事，絕沒有名著的風采。如被重編過數次的泰坦尼克號冰海沉船，一旦被美國式大投入、大製作、高科技重新包裝，美輪美奐，人見人愛，默多克的投入沒有白費力，它從最貧窮的國家照樣能大發其財，無怪乎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娛樂市場百分之八九十被西方佔領。與默多克合資的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誹聞纏身，劣跡斑斑，屢遭起訴，但次次過關，又再次當選總理。所有的媒體工作者都明白，早晚要成為花花總理貝的雇員。發達國家如此，其實香港也一樣，在香港罵總督可以，罵特首也可以，但絕少有媒體放言罵李嘉誠。因為香港的媒體離開李嘉誠的房產廣告，很難存活。

這是資本的硬道理。

《北京青年報》的〈誰看，看什麼，看到了什麼〉沒說錯什麼，《獅子王》中由一名著名的黑人演員為反派角色獵狗進行的油腔滑調的配音，把王者的秩序渲染為永恆的正義。那是在 1995 年看《獅子王》，十幾年過去，天道輪回，恍如隔世。仿佛一夜之間，中國闊起來。大學裡的知識分子不再哭窮，大家都脫俗致

¹⁵ 〈誰看，看什麼，看到了什麼〉，參見《北京青年報》1995 年 8 月 25 日，第 8 版。

¹⁶ 《北京青年報》1995 年 8 月 24 日，第 6 版。

雅，儒林鳥兒全唱歌，又換了什麼調？中國知識分子，最好對外是唯美主義（唯美國馬首是瞻），帶搞點人文關懷，如臨終關懷。而在單位溜上媚師欺下，虛名實力一樣不少。古人云：“衣食足而知榮辱”。其實，衣食足了，也未必知榮辱。回首望望 1995 年知識分子的心態，人家的大道理、硬道理怎能抵得過。

20 世紀 80 年代，人文知識分子考慮問題的出發點還是自己窮，人家闢：“搞汽車的大聲疾呼政府得保護國內市場，高高地給進口汽車課以關稅，而他們給辦公室買電腦、電視機時又不斷叮囑“要買原裝進口的”。他們上電影院時也情願去聽“真實的謊言”，去品味《獅子王》的吼聲。而竭力抵制外國電影的人呢，有幾個家中的彩電、冰箱、錄像機是一水國貨？”

自由主義者，想西方所想，思西方所思，批判“用一些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東西去讓西方人感到刺激、感到陶醉，或者噁心”而已；還有更具文采而更有力的語言是：“有意識地去迎合西方讀者的胃口，用作品的膿疤去賺取同情和金錢。”

他們為西方辯護的言詞，連西方的衛道士都不好意思，如此直白：不管用了什麼“主義”來概括或形容，我懷疑這種心態會不會落入有點狹隘的民族主義。弄不好，這種心理會帶上一種天朝大國一切古已有之的得意和唯我精神文明最高的自信，這容易導致一種不大肯耐心觀察研究外部的世界和別人的心態。這種心態的深層往往是一種觀念體系失散、失落後的虛弱和簡單保護的抗拒。這種抗拒有時會變成不管事實、不顧力量對比的揭竿而起的有組織暴力。這種暴力有時可表現為義和團式的義舉，其實是在封建思想秩序和迷信觀念方法指導下的亂打亂殺。

西方中心論的理論很鮮明：義和團是民族主義，只有八國聯軍是國際主義。

當今，用主流知識分子“大國崛起”的豪情版去看十幾年前主流知識分子的悲情版表述，他們真變了嗎？繼續看他們毫不臉

紅的表述：

“各種講座中我覺得被忽視或故意很少被提到的另一種傾向是民粹派觀點或義和團心態的現代翻版。在今天，這種論調是更有誘惑力、更有破壞力的。不知是否因為有各種先入之見，關於‘東方主義’和‘後殖民語境’的講座很快就出現了過多的誤讀。原本是確有意思的詞很快就被自說自話式的使用攪上了污垢，成了觀念的奧吉亞斯牛圈。對於國外優秀作品的品評、認可和國內藝術家與世界對話的努力，往往被斥為‘東方主義大合唱’或曰是在‘後殖民話語’系統裡中了圈套而不自知。至於身處東方中國文化中的人，我認為是‘東’不起來的。我每天扳著手指頭數鋼鏹買煎餅果子，像罐頭裡的魚們一樣擠著公共汽車去上、下班，耳邊聆聽著孔孟之道如何高深、新儒學如何挽救未來世界的教誨，哪裡能如此清醒並且居高臨下地將‘東方文化’當作別人、別處的‘他者’來研究。正視還不斷地碰壁呢！”

今天的民粹派理論家往往犯兩個錯誤，一是過分強調差異，在許多沒什麼大差異的地方也要找出民族特性。說玄乎點，這種心態再走幾步就是種族主義。另一個錯誤是僵化地、靜止地看事物，把民族看成是一個固定的東西。今天，中華民族正產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欣賞口味、心態，甚至接受語言、畫面、聲音的節奏都提高了，我們必須在變化發展中看民族特性，去分析我們審美心理的變化，而不拿某種先入為主的、固定的特性去抵制美學上的交流。

《獅子王》的內涵簡單嗎，並不簡單。它以友誼、愛情、家庭內部的柔情和基本的善惡判斷為撼動觀眾感情的基礎。在此之上還使用了改造模式的敘事方法，揉進了無深度的思想、無批判的價值觀等現代語言遊戲。卦象占卜也都用來豐富劇作，以使欣賞本劇的觀眾面更大、人更多，成人不是也發現令人怦然心動和會心的微笑之處嗎？甚至連禪宗的意味都用上了。老教父拉非齊狒狒敲在辛巴頭上的那一棍就是六祖壇經、曹溪佛唱的回聲。更不用說，本片的

動物擬人神情、非洲自然景色是畫得極認真、極見功力的。它還在動物世界的爭鬥中用上了中國武打片的動作設計。

還有一個疑惑是：談到意識形態，在當今中國，是“文革”意識形態、封建思想阻力大，還是殖民主義話語的威脅嚴重。我看是前者更有力、更可怕。我一向把“文革”意識形態看作是中國封建思想的一個高峰和最後的大閱兵。

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背靠背，臉對臉》、《飲食男女》、《喜宴》、《霸王別姬》等影片中，我看到了更成功的話語交流。這些影片克服了影響的焦慮，在世界現存的十分完美、嚴密的美學市場上有了一塊地盤。

不久之前，哈佛大家著名政治哲學家諾齊克說：“一個自由體系是否將允許這個人把自己變賣為奴隸？我相信它將允許。”自由主義的思想源頭之一，“自然權利”理論，最初是為論證自願當奴隸的合理性。耶魯大學教授提出《西方文化的奴隸問題》，該書榮獲 1967 年普立策大獎。1979 年，劍橋大學思想家塔克：“既然人擁有自身，也就可以自願地把自身轉讓出去當奴隸”。你不要認為這只是少數學者的奇談怪論。1995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 日，由美國出資的戈爾巴喬夫基金會，五百名最重量級政經人物齊聚一堂，其中包括喬治·布什、撒切爾夫人、布萊爾、布熱津斯基、索羅斯、比爾·蓋茨、未來學家奈斯比特等大名鼎鼎的全球熱點人物，討論全球化和 21 世紀大趨勢。會議的與會者把簡化為“20 比 80”和一個“靠餵奶”生活（tittyainment）的新概念。危言聳聽：五分之一“精英”對五分之四“無賴”的戰爭。製造業首屈一指的中國，也被歸為“垃圾人口多數分佈的不發達國家”，也被劃入 80% 的“廢料人渣”中！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達爾文的優勝劣汰，弱肉強食；尼采的“超人”對“群畜”人渣宣戰。一句話，當今地球負載的無用而劣質的人口太多。

中國人自鴉片戰爭，被洋人打得頭破血流，發現西洋人果然不凡，膝蓋一軟一發不可收拾。代之而起的美利堅是人家先進文

化的後起之秀，遂無力掙扎更無心掙扎，這一面倒的奴勁，借改革開放的東風一發不可收。現在洋大人不需要絲毫強迫，我們也沒有絲毫的不舒服，如水之趨下，如人往高處走，人家在高處，人家是國際大趨勢，學西方果斷無情，悠久的鄙亞羨歐，聯強伐弱，取代中華，稱霸東方，引導它不斷地飛躍勝利。如今日本的動漫，不僅在中國，在世界都有了一席之地。¹⁷

六、從西方看中國，從中國看西方

李零用三大文明圈來描述古代文明的來龍去脈，交互傳遞發展。如果細分文明應該首推美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它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鉅著，雖然偉大並不代表全部正確。湯因比把六千年的人類歷史劃分為21個成熟的文明，埃及、蘇美爾、米諾斯、赫梯、巴比倫、古印度、希臘、伊朗、敘利亞、阿拉伯、古中國（商代）、安第斯（南美洲）、瑪雅（中美洲）、中國（唐以後）、天竺（興地）、朝鮮、日本、拜占庭、俄羅斯、墨西哥、育加丹，另外還有五個中途夭折停滯的準文明：玻里尼西亞、愛斯基摩、遊牧、斯巴達和奧斯曼。細分的缺點是不能十分準確，不如三大文明圈確定。但用“文明”單位代替國家單位，是前進了一步，用“國”劃分不行，古代“蘇美爾”、米諾斯、赫梯、巴比倫、希臘、伊朗、敘利亞都不是“國”。在這點上我們也不能搞中國中心論，它們中的一些文明，比古中國更早，過去我們常用的“四大文明古國”說，並沒有得到世界歷史學界的公認，不規範也就不科學。

不是“國”也就應改為“文明地區”。考古研究表明，年代最古老的幾個文明地區是：西亞的兩河流域、北非的尼羅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這三大地區首先出現了文字和青銅器，黃河流域是否

¹⁷ 郝建：〈義和團病的呻吟〉，《讀書》1996年第3期，第3~9頁。

能和上述三大文明比肩，現在還沒有考古證據，現在看到的證據，中國甲骨文在年代上遠遠晚於尼羅河流域象形文字和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印度河流域可考文字兩千多年。如果今後發現了夏代文字，歷史還可改寫。不過，“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區”，由於蠻族入侵，文明出現斷裂和失落。但文明並沒有完全湮滅，許多文化保留下來，比如世界通行的拼音字母、工具、器物、建築。

其實，古代的文明並不總是相互隔絕，海洋也不總是讓各種文明隔絕，有隔絕也有傳播，只是傳播的速度比現代慢得多，影響重大而深遠而一直延續到現在的文明地區，是希臘文明，後來與猶太、東羅馬、中國的蒙文明融合，印度文明（佛教），梵文經典和中國夏商文明，後與中華各族文化融合，中國的蒙元文化在其中也起過各大文明的串聯作用。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區和延續至今的三大文明地區，或“人類文明的五大發源地”：西亞地區、北非地區、印度地區、希臘地區、華夏地區，用今天的水準看並不全面，比如中北美洲文明地區的文明，對人類的貢獻也不可抹殺。所以，在進一步論證資本主義文明是世界各大文明碰撞、變異的結果，在進一步進行東、西方比較時，我們將一直受到忽略的美洲文明的貢獻放到第一部分。

（一）玉米與資本主義¹⁸

來自美國聖若望大學的歷史學者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教授以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為話題，和我談起美洲白銀對明清以降，白銀對西方資本主義產生及對中國社會與經濟變遷的影響。當時我說，美洲對中國社會的長期影響最為重要的恐怕不僅是美洲白銀，而是美洲農作物，比如玉米、土豆、紅薯、花生、煙草，尤其是玉米的引進和栽培，直接導致中國17世紀以來的人口大爆發，直到今天，中國的人口問題還與此關係重大。

墨西哥學者阿圖洛·瓦爾曼關於玉米與近代世界歷史的著作《玉

¹⁸ 陳亞平：〈玉米與資本主義〉，《讀書》2007年第12期。

米與資本主義 —— 一個實現了全球霸權的植物雜種的故事》，在玉米這種美洲作物被引種到舊大陸之前，1500 年左右歐洲的人口只有八千萬，與 1300 年的數目相當。玉米、馬鈴薯等美洲作物引種到舊大陸，使歐洲的人口數量迅速增長。1700 年歐洲居民達到了 1.2 億，“到 1800 年達到了 1.8 億。19 和 20 世紀出現了被稱為生命革命的人口爆炸，1900 年，歐洲人口達到 3.9 億，1975 年是 6.35 億”。在這個過程中，18 世紀之前，玉米在歐洲主要是人的食物，玉米特別在農耕和農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 19 世紀初，玉米已經影響到了歐洲 40% 的人口，包括玉米的種植者，也包括玉米及其相關食品的食用者。整個 19 世紀，玉米在歐洲的聲名“甚囂塵上”。¹⁹

在世界的另一端，“玉米在中國的出現偉大而意義深遠”。16 世紀上半葉，玉米開始經過雲南、福建進入中國，迅速在中國廣闊的山地蔓延。中國人以各種方法食用玉米：早收的青玉米被當做蔬菜，成熟後收穫的玉米則被磨製成粉而後加工成玉米餅或玉米粥。玉米還被用來製作燒酒、啤酒，甚至蒸餾出威士忌。繼水稻、小麥之後，玉米取代了高粱，成為中國第三大主要食物。僅僅經過四百年左右的時間，中國人口從 1600 年和 1700 年的 1.5 億，增長到 1800 年的 3.2 億，1900 年是 4.5 億。到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人口超過十億，而中國的糧食供應還基本達到自給。在玉米作為人民食物的國家中，中國是最大的玉米生產國。

然而，瓦爾曼更加關注的是玉米在舊大陸引起的從農耕、貯藏、畜牧到人的生活方式、村落景觀、城市化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複雜變遷。首先，玉米在歐洲迅速取代了傳統的夏季穀類作物高粱、黍和粟，成為夏季草場休耕閒暇時的主要作物。傳統的休耕輪作制度演化為常年的複合作物栽培形式，大大緩解了人口對土地的壓力。

¹⁹ 谷曉靜譯，阿圖洛·瓦爾曼著：《玉米與資本主義 —— 一個實現了全球霸權的植物雜種的故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第 121~125，45，122 頁。

其次，玉米結束了歐洲糧食短缺的困境，尤其是在夏季，“仲夏後通常是饑荒的季節，而玉米恰好在這個時段成熟，以往循環往復、年復一年的糧食時而氾濫時而短缺的惡性循環現象也消失了”。玉米仍然是成就歐洲農業革命的因素之一。“農業革命是其他革命的前提，是建立自由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世界的基礎。”

在歐洲，玉米不僅成為窮人的食品，也為地主、佃農、放債者、土地領主和新的中產階級帶來了財富。隨著歐洲封建制度的演變，原來凝結在土地關係上的政治關係轉變為一種經濟關係，土地私有的確立使得地租剝削成為土地領主的財富來源。許多佃農是富足的商品生產者、第三等級的鄉村平民和殷實的農民。封建制度衰敗的歐洲社會結構日趨複雜，不同階層和集團之間的差距也在日益增大。人們出於不同的目的引種玉米。巴爾幹和多瑙河谷的地主、南方的土耳其人和北方的天主教徒大種植園都在積極種植和出賣玉米。“但大多數從玉米中獲益的人從不食用玉米，他們只吃小麥。”²⁰ 玉米種植成本低、產量高，可以高效率地達到自給自足。歐洲的農民選擇種植玉米以抵消不斷上漲的地租、創造剩餘產品。同時，玉米惡化了農民勞動的節奏和景況。取消休耕、輪種、夏季作物意味著更長的勞動時間和更密集的土地掠奪。商業化和密集型農業不謀而合。18世紀之前，玉米是農民和城市貧民的主要食品，18世紀之後，玉米逐漸成為肉、奶食品生產不可或缺的飼料資源，成為商品生產轉化的中間消耗物，為歐洲的城市化、商業化提供基礎保障。

美洲是玉米的老家。印第安人教會了來自歐洲的殖民者種植玉米。玉米是奴隸們的主要食物來源，每個成年奴隸每天約獲得兩磅玉米的配額。這時候北方的城市化和有效的商業運作系統已經開始改變人們的食譜。城市飲食中對玉米的依賴越來越小。到20世紀80年代，

²⁰ 谷曉靜譯，阿圖洛·瓦爾曼著：《玉米與資本主義——一個實現了全球霸權的植物雜種的故事》第132，193，24頁。

美國的玉米年總產量已經創造了 2.24 億噸的紀錄，約為世界總產量的一半。而美國 1980 年的人均玉米消費量僅僅與 1910 年相當，肉類特別是牛肉的消費迅速增長，1929 年美國人均年度肉類消費只有 50 磅，1975 年上昇到了 120 磅。如果加上禽類食品、奶製品、黃油等，美國人均年度動物類食品的消費達到了 450 磅，平均每天一磅還多。美國兩億數千萬噸的玉米年產量中，約有 61% 的鉅額部分被其國內畜牧業消耗掉了。美國人用玉米提取乙醛醇，製作酒精——汽油的混合燃料，以應對高昂油價的衝擊。美國人還將佔自己年生產量 30% 的玉米出口到世界各地，成為富國牲畜的飼料，窮國居民的口糧。玉米成為美國的戰略能源，在國際關係中具有重要作用。

那麼在中國，是否也如此呢？瓦爾曼與何炳棣一樣，認為玉米在中國扮演了開荒者的角色。玉米從福建和雲南進入中國後，逐步向江西、貴州、四川、湖北以及陝西南部的山區蔓延，最後在東北完成了對整個中國的影響。瓦爾曼沒有能夠對玉米的中國種植作出類似於它在歐美那樣的社會人類學說明。可是，一旦我們打開中國文獻，看看關於玉米的記載，玉米所具有的那種“窮人的食品”和市場開拓者的形象煥然就在眼前。

在這些地方，玉米是農民一日三餐的主要內容。它們的共同之處是：美洲作物土豆、紅薯等來到中國，也一樣曾經主要是一種“窮人的食物”。農民把玉米作為自己的主要食物，而把市場價值較高的稻米、小麥等變成了商品，出售到發達地區和工商業城市這些集中消費稻米、小麥的地方。就像那個時期的華北農民，經年累月以高粱、小米、玉米、番薯和土豆果腹，把有限的小麥變賣到城市。那時北方許多村落的普通農民曾組織起類似於“饅饅會”的組織，平時積攢資金，只有到過年的時候才動用這筆共同基金買點白麵，吃上一頓白麵饅饅、白麵餃子。事實上，即使在湖南這樣的稻米輸出大省，直到清末，有些地方的農民也依然食用玉米——這並不排除在同一時期，湖南另外一些農民把玉米作為飼料餵養鴨子。玉米從新大陸來到舊大

陸，一開始就有兩種不同的身份，它是富人家的飼料，窮人家的口糧。

還應該注意到的是，由玉米等美洲作物推動的山區開發，減緩了清代中國人口與耕地之間的矛盾，使許多當時重要的手工業原材料有了更加廣闊的生產地，不僅像江南、廣東的大量耕地成了棉花、桑樹、甘蔗、花木的種植基地，而且像桐油、藍靛、生漆、苧麻等等就曾經是四川、湖北等地山區農民重要的輸出物資。這些對清代中國手工業和商業發展不也具有促進性的影響嗎？

瓦爾曼的玉米史考察了玉米流傳在世界不同社會產生的各種錯綜複雜的效應，使人們知道玉米從一種窮人的食物到現代世界重要商品的進化歷程，“整個世界都從美洲農民的智慧中受益匪淺”。今天，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玉米生產國，也是全球第二大玉米消費國。除了日益增長的飼料消費外，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推廣玉米乙醇作為動力燃料，一些省市開始禁止銷售普通汽油，與此同時，仍有數以萬計的中國農民一日三餐離不開玉米。但是，中國玉米的社會史還是一塊尚未開發的處女地。

（二）從西方看中國

西方的文化歷史觀，他們的共同錯誤是西方中心論，傲視其他文明，這在 19 世紀是必然，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的局限。世界三大文明圈，現在的水準看，離開哪個都形不成資本主義文明。資本主義從它一產生就是國際的，制高點一旦形成，形似穹廬，籠蓋四野，羽翼豐滿，威絕四海。世界各文明按它的需求排隊劃線，歐洲中心論是他們根本改不了的，主心骨，西方的國際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大地方主義，國際就是西方文化，西方那種文化優越感是情不自禁，掩飾不住，揮之不去。道理是現代化劃線，絕對支配地位，近代各種文明都是西方的手下敗將，戰爭從來只有強者的話語權，包括征服美洲，殺盡印第安人，販賣上億黑奴，理直氣壯，大言不慚，從不臉紅。當我們對“五種形態說”、亞細亞生產方式說、分期、萌芽、停滯三說、東方、西方、三大異同進行分析之後，對中

國學者比西方還西方的西方中心論的批判就駕輕就熟、如臂使指。中國新的西方中心論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仍是換湯不換藥。

“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長期延續”和“資本主義在中國萌芽問題”的討論，實際上都是探究為什麼中國未能像西方那樣儘早地產生資本主義（196個國家，除西方幾個國家，都未儘早地產生資本主義——作者註）。

一些西方學者倡導的“東方中心主義”使此問題再度成為熱點話題。美國學者弗蘭克和彭慕蘭提出西方率先現代化偶然論。²¹彭慕蘭在《大分流》中提出，英國及歐洲的工業化幾乎完全是一種“歷史的偶然”。18世紀中葉以前的中國與西歐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只是煤的廣泛使用和美洲新大陸殖民這兩項“根本性的突破”，才使西歐勝出。²²羅伯特·馬克斯在《現代世界的起源》中明確表示他深受弗蘭克和彭慕蘭的影響，他也認為西方的興起有著相當的偶然性，並強調煤炭資源在西方現代化中的作用（現在西方的先進學者形成這樣的共識，站位比過去高得多，資本主義的隨機耦合的條件比農耕文明形成的條件複雜得多——作者註）。²³

“東方中心論”的橫空出世，無疑適應了中國歷史學批判“西方中心論”的需要，因此它受到許多學者的熱情關注，也有一些學者對這種標新立異之論進行分析和批評。《社會轉型時期的西歐與中國》（下稱《轉型》）指出，彭慕蘭把煤礦認作英國工業革命最重要的條件，問題是中國並非不存在這種條件。中國不缺煤礦，而且有長期採礦的歷史，為什麼這些煤礦沒有使中國發生工業革命？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在18世紀之前英國沒有發現和利用這些煤炭資源（煤炭的大量使用是資本主義產生諸多條件之一，如果以為煤炭的大量使用

²¹ 方曉：〈從西方看中國：中國傳統社會再認識〉，《讀書》2007年第12期。

²² 彭慕蘭：《大分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

²³ 羅伯特·馬克斯：《現代世界的起源》，商務印書館2006年。

就能產生資本主義，如同說一顆精子就能使人懷孕 — 作者註）？

《轉型》認為，中國的落伍與西方的崛起一樣，並非偶然。中國與西方很早（起碼在 12 世紀，而不是明清）就存在著結構性差異，它決定著以後各自的發展方向，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像西方社會那樣產生資本主義。為論證這一點，《轉型》先從資本主義起源談起。

中國歷史的發展也說明貿易起源說和城市起源說站不住腳。中國從戰國時起就有了發達的商業經濟和城市，但是卻並沒有因此產生資本主義（這都是重要條件，但並不是足夠條件 — 作者註）。

關於西歐資本主義的起源，還有一種“暴力說”，而“暴力說”又與誤讀“原始積累說”相聯繫。這種說法把對外掠奪殖民地和對內剝奪小農看作是資本主義產生的主要原因，因而資本主義被認為完全是血腥和野蠻的暴力之產物。英國的“圈地運動”被看作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典型。托馬斯·莫爾對“羊吃人”的譴責無疑加深了人們對原始積累的印象。《轉型》則指出，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歷史上始終有統治者對臣民及生產者的掠奪，但暴力剝奪自身不能產生資本主義。農業資本主義的基本要素在圈地運動前業已基本形成，原始積累首先是經濟積累、市場積累，重要的是開闢了市場積累的道路，暴力只是資本主義的催化劑。更進一步看，西歐的原始積累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在所謂原始積累之前，西歐已經經歷了長時期的“前原始積累”，這使西歐農村經濟與社會取得長足的發展。

“前原始積累說”是《轉型》作者的獨創。《轉型》由此而超越了此前的幾種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主要論斷，如貿易起源說、城市起源說和暴力說等。李零對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分析洞微燭隱而直言無忌，撥雲見天而明察秋毫之末：六百年歐洲黑暗中世紀再落後，它導向現代化，中國古代社會再先進，它導向停滯，這是倒罨看反面的單線思維。“前原始積累”說代替貿易起源說，城市起源說、暴力說，今後還可以有前前之說，都是從結果求證原因，越說越糊塗。英國也好，西方也好，發展方向的結構性要

素能導向資本主義，沒有多種文明的碰撞的共同作用，沒有其他文明為資本萌芽作培養基，一國一地產生資本主義，是夢囈！

《轉型》的作者認為，與英國相比，中國明清時期並沒有經歷像英國以及西歐那樣的前原始積累。中國農民不是普遍富裕而是普遍貧困。清代相當多的農民收入是負增長，求溫飽都困難。農產品的商品率和儲蓄率，中國的農戶都大大低於英國的農戶。橫向的比較是如此，縱向的比較更能說明問題。英國中古晚期的糧食生產率比中期提高了近 1.4 倍，而中國清代與明代相比不僅沒有上昇，反而下降（這一先進說法否定了統計學常識，直到 1800 年，中國的生產力還比西方先進——作者註）。

西歐農民的經濟力量為什麼能夠持續增長？經濟史實不能完全由經濟因素來回答。《轉型》始終致力於探討決定西歐社會發展方向的結構性要素，該書從大量的史實中發現，西歐生產者儘管經濟發展的起點很低，物質生活比較艱苦，但是他們很早就有較強的自我保護意識及能力，因此能堅守一種個體權利的底線（個體權制的底線說的是什麼，農奴的人身依附好於自耕農？——作者註）。

《轉型》中還說，當佃戶的權利受到領主侵犯而又不能得到莊園法庭保護時，自由身份的佃戶可以越過莊園法庭向王室法庭申訴冤情。在英格蘭的斯塔福德郡，有三個佃農與其領主進行了長達 35 年（1272~1307 年）之久的爭訟。15 世紀初，沃里克伯爵的全體佃戶與領主數次談判，迫使領主作出重大讓步，地租竟下降三分之二以上。莊園的檔案記載了領主妥協的原因：“若不降低地租，他們（佃戶）就要集體離開莊園。”種種事例表明，西歐的習慣法及法律制度對於中世紀小農經濟的發展是一道保護性的防波堤。

由於能夠有效地限制領主的剝削量，使得農民，甚至農奴能有較為普遍的和持續的財富積累。據經濟學家統計，農民每交給領主一個便士，就往自己口袋裡放進六個便士（以上兩段的論述完全是自編自導的好壞人故事——作者註）。

《轉型》得出這樣的結論：法律保障機制對於西歐社會的轉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西歐的法律與法律體系，不僅避免各級領主的恣意侵奪，還表現在限制全國性賦稅，抑制王權與政府的非生產型消費，從而有助於整個社會的生產積累和開發。相比之下，有學者認為，中國因為缺乏這種法律保障機制，政治權力對個體權利的壓抑造成了社會的相對停滯，這是中西社會差異之關鍵。（中國“法若凝脂”，一點兒不比西方差。唐代的“兩田法”，明代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法，對自耕農的保護史不絕書，但和西方一樣說明強勢者對弱勢者的剝奪具有擋不住的誘惑——作者註。）

在這裡，不免要涉及對中西勞動者地位的認識。中國史學界普遍認為，佔當時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自耕農”有比西歐農奴更優越的生產條件。西歐農奴人身不自由，而中國的自耕農有一定的獨立性，有自己的土地，能夠自主經營，人身依附關係較輕，因而比西歐中世紀的農奴有較高的生產積極性，能夠創造出更多的財富。《轉型》認為這是一種誤解。該書說，嚴格地講，直至近現代以前，中國沒有自耕農。自秦朝以來兩千餘年的古代社會中，中國只有“編戶齊民”和各種形式的佃農（這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樣不能否定，中國很早就有了可以自由買賣土地的自耕農——作者註）。

《轉型》支持者認為，比較歷史學在中國是一門新興學科，目前僅有少數世界史的學者在從事這項研究，尚未引起更多學者的參與和關注。《轉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視野即新的觀察角度，拓寬了歷史學的研究領域。一位研究中國漕運的學者一次問一位西歐史專家，西方的漕運是怎麼搞的。西歐史專家笑著說，西方哪裡有什麼漕運呀。西歐的國王根本沒有能力迫使人民為他們運輸所需的物資，只能自己跑腿，到各個王室領地去就地消費農產品。《轉型》中也介紹了西方國王“巡行就食”的情況，這說明了中、西王權的差異。只有時時處處與外國的歷史相比，才能更清楚地認識自身的歷史，才能準確地把握中國社會的特徵（“大一統”和漕運是文明

發達的表現，反之是落後——作者註）。

《轉型》支持者認為，《轉型》所採用的方法對當代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及其學術轉型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特別是那種“從西方看中國”的歷史比較研究方法有助於解決一些懸而未解的重大課題。例如中國“封建社會”（因沿用老說法而加上引號）長期延續問題，實際上是相對於西歐封建社會而言的，這一問題的實質是說中國封建社會的時間比西歐諸國長，沒能像西歐那樣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問題雖由西方引起，研究卻未從西方做起。幾十年來一直是緣木求魚，閉門造車，所以得不出結論是自然而然的。用《轉型》提供的方法，這類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中國社會的“封建性”問題也是爭論不休的一個大問題。中國人理解的“封建”概念本是從西歐的“封建”演變而來，大多數學者卻不去探討“封建”的西方本原，所以長期以來難有定論。即便是中國特色的“農民戰爭”研究也能通過與西方歷史的對比得出新的認識。以往中國學界的主流觀點是階級鬥爭動力論和與之相關的農民戰爭動力論。在新時期，有學者質疑這種觀點，說中國農民戰爭多，社會卻長期停滯不前，而西方農民戰爭少，也就是階級鬥爭少，社會進步反倒比中國快，可見，階級鬥爭並非是歷史發展的動力。

中國沒有對個體的法律保障機制，中國古代勞動者的地位不如農奴，甚至中國沒有自耕農，小國寡民的遊食制度勝於中國的漕運制度，大一統的中央帝國不如西歐小國林立的封建，中國有特色的農民戰爭不僅不是動力，而是社會前進的反動力，一切中國現代的不如人，都要倒霉看反面。我看不是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停滯，而是這些人的思維停滯了，不是中國進入了什麼長期不變的傳統社會結構，而是我們的思維進入了緣木求魚、閉門造車的怪圈。同期相比，直到 1800 年，中國養活的人口，大大高於全部歐洲，農耕文明的中國是世界的頂峰，這種事實還用爭嗎？

李零說：“我認為，中國沒有自行進入資本主義”，沒有必

要沒完沒了地追問。工業文明的發生，與農業文明的發生不同，是從一點出現，然後傳遍全球。這種體系一經形成，再談其他國家獨立發生的問題也就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資本主義的帶頭國家很少，其他都是受傳播影響的後發型，大家用不著在這個問題上浪費精力。如果法國、德國、美國、日本以及全世界一百幾十個國家，他們的學者也都像我們這樣，非要追問自己為什麼沒有自行進入資本主義，那麼是什麼結果？……恐怕中國社會並沒有“長期停滯”，倒是我們這些人的心智是“長期停滯”了。

（三）從中國看西方

打開中國地圖，從東北向西南劃一條斜線，適合人類居住生活的地方和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涇渭分明，馬上就會看到這塊傾斜的地面。大西北、大西南人居不易的背後是荒漠高原，崇山峻嶺，世界 14 座海拔超八千米的高山，有 11 座在中國的青藏高原。“西出無故人”，我們不去看。適於人居的東北、東南，前面是茫茫大海，我們看不見。面對三大洲，不似南亞、北非、南歐，環地中海這個小澡盆，自古便於交往。這樣的地形地貌，使古代中國人很難留心別人，也很少反觀自己，那時當然不會也不需要東西對比。古人的地理觀，就只能是《淮南子·天文》上著名的傳說，說共工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李零說，東西文明是相互隔絕的，“君住球之西，我住球之東”，不在同一個競賽場地。從前我們對農業文明有很大貢獻，但現代丟了“老大”，許多人倒霉看反面，也是“回溯性反差”，認為中國的落後是從根子上就有問題，中國落後的根子是歷史命定，自古的根不紅，苗不正。許多中國人講歷史，是按照現代的情緒，教科學的“常識”編寫，西方自古“開放”，中國自古“閉塞”。²⁴

其實西方古代的主體也是農業文明，西方的農業文明也是內陸

²⁴ 李零：〈歷史怪圈〉，《放虎歸山》第 3~7 頁。

文明，他們的農耕文明是源於西亞，從東南歐分兩線向北、向西傳播，走中歐的那條線特別發達，也是在黃土地帶上發展起來的。

中國人“差距感”的壓力太大，幻想幻聽幻覺的歷史包袱太沉重，發展到一種民族自卑的地步。於是就有了為什麼中國是“大一統”而不四分五裂？為什麼中國人吃糧食不吃肉？為什麼用方塊字不用拼音文字？為什麼要獨尊儒術而不搞宗教大一統？為什麼希臘、羅馬時期就有民主和共和國而中國勝產專制？一罵祖宗、二罵山川、三罵人口，將歷史給定的條件和中國歷史的許多優點都當成缺點，心態失衡是近代以來的挫折感太大。

其實，中國人大可不必“一闊臉就變”，也用不著“一窮氣就短”，什麼“神州陸沉”、“開除球籍”、“競賽意識”極強。不斷用“奧運”式的大目標為自己打氣。想讓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當主體文化，那是不可能的。但直面看西方，直面看中國，古今中外都要直面而觀。中國人歷史上會種地，養活了許多人，這在古代是文明進步的表現，“文革”後卻成為大問題。但30年的實踐，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進出口發展成世界第二，二億農民進入非農領域，人口紅利又成中國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所以，李零在1980年代後期，對中國人口問題的分析，今天再讀也有意義：

至於今天中國人口問題的癥結何在，我們也該好好想想。日本的人均資源難道不比中國更少？中國在近年中已有八千餘萬農村勞動力轉入了工業經營（這是李零20世紀80年代的分析——作者註），正在為解決人口問題摸索著自己的道路，所以有些事並不像初看起來那麼可悲。控制人口和積極尋求經濟出路是一回事，怨天尤人，罵祖宗，以為今天的一切都是命中註定則是另一回事。

的確，你沒有耐心學會正面看問題，直面西方，直面中國，那也就別怪自己碰上歷史宿命的“怪圈”。

王小強先生所進行的古代中西經濟的比較，學貫中西，研精慮深，足已對西方中心論提出不同的實證。王小強對西方自古先

進說神話進行了批判。

西方封建社會的建立，日耳曼蠻族席捲歐洲的民族大遷徙，前後持續近兩個世紀（376~568年），摧毀腐敗的羅馬帝國，沿襲原始馬克村社制度，分封土地和人民。人民從奴隸變成隸農、農奴，與大塊土地一起依附貴族，組成莊園經濟。莊園內部是農奴為貴族貢獻無償勞役，農奴之間換工和物物交換。大莊園通常有鐵匠、木匠、車夫、磨坊、獸醫、理髮師、牧師，萬事不求人。²⁵ “每一座封建莊園都自給自足，甚至軍費也是徵收實物。沒有商業往來和交換，用不著貨幣。”²⁶ 直到13世紀，“有產階級的生產幾乎不超過其自身的需求，幾乎不消費任何非本地生產的物品”。商品交換極不發達。14世紀的法國，“度量衡因省而異，因城不同……有時在同一城市裡，度量衡也各不相同”。²⁷ “在18世紀的米蘭，流通於市面的硬幣多達50種。”²⁸ 法國到大革命時代（1797年），德國到俾斯麥時代（1871年），才統一各小國，統一度量衡。中國在公元前兩百年，秦始皇統一六國，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²⁹ 中西比較，實現商品交換的同樣條件，歐洲比中國晚了兩千年。³⁰

耕地由於沒有得到充分耕耘，而且幾乎總是施肥不足，穀物的

²⁵ 布瓦松納：《中世紀歐洲生活和勞動》，商務印書館1985年。“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年梅特蘭對莊園概念的表述最具有權威性。他認為典型的莊園應和村子一致，即一村一莊，莊園的土地分為領主自營地（由農奴的無償勞役耕作）、自由領地和農奴領有地。”參見朱寰：《亞歐封建經濟型態比較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第92、107頁。

²⁶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49頁。

²⁷ “每到一處，商人都必須對他的商品按當地量制重新量度”。參見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1~15、71頁。

²⁸ 金德爾伯格：《西歐金融史》，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年，第24頁。

²⁹ 《史記·貨殖列傳》。

³⁰ “不應當把中國比作是歐洲的一個國家，而應比作為整個歐洲”（羅素：《中國問題》，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54頁）。整個歐洲1005萬平方公里。

穗子長得既輕且疏。尤其是，並非全部耕地同時都有收穫。這一階段人們知道的最先進的土地輪耕制，要求每年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耕地休耕。休耕地和耕地通常無規則地相互交替，聽任雜草生長的拋荒時間總是多於耕作物生長的時間；在此情況下，耕地比臨時耕地或開墾不久的荒地幾乎好不了多少，甚至在農業區的中心地帶，自然的野生狀態也傾向於不斷地重複出現。在耕地的遠處、耕地的四周以及穿越耕地中央的地方，是森林、灌木叢以及沙丘。

（對封建主來說）必須就地消耗每一領地的產品，因為要把產品運送到某一個中心，既不方便也相當昂貴。對商人來說也同樣如此。他們沒有可以託付買賣任務的代理人，而且無論如何都肯定無法在一個地方找到足夠的消費者，以保障他的利潤收入……而鑄幣的無政府狀態是政治權威依等級分割和交流困難所造成的另一後果，因為每個重要的市場都面臨著通貨短缺的威脅，不得不鑄造地方性的貨幣……更糟的是，即使在同一地區，幾乎每次發行的貨幣，其重量和成色都有變化。貨幣不僅普遍匱乏，質量不可靠而造成使用上的不方便，而且流通也過於緩慢，太不正常，人們並不相信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得到它。³¹

當時許多大封建主，曾採取巡迴就食的辦法，即把自己的地產分為若干莊園，帶領家人、隨從於每個莊園停留若干時間，把那裡一年的收穫物消耗完後，再轉移別處，如此周而復始。只有某些大修道院，因為地點固定，不能轉移，才組織大量勞力，把各莊園的物資運抵中心地區，供應給那裡的修道士。可見，封建主組織生產的目的主要是為供給自己消費，而對外交換只有偶然性，只是用剩餘產品交換本身無法生產的產品。這就決定了封建主經濟的自然性質。³²

³¹ 《史記·貨殖列傳》。

³² 朱寰：《亞歐封建經濟型態比較研究》第91~92頁。

中國的小農經濟，家庭經營，從來不是歐洲莊園式或俄國村社式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是中國市場經濟高度早熟的生產方式基礎。

古代農業生產，直接依賴自然條件。與歐洲平原地勢平坦、氣候濕潤、降雨穩定的自然條件相比，中國天上是獨特的大陸季風氣候，西伯利亞、帕米爾高原的乾燥冷空氣和太平洋、印度洋的濕潤暖流你來我往，溫度變化大，四季分明，降雨極不均勻；地上 70% 的國土是山地丘陵，土地零碎分散，高低起伏不平。天上地上的自然條件疊加一起，各種動植物物種極其豐富，各種地震、水旱、風雹、蝗螟、霜雪、疾疫極其頻繁。³³ 原本沒有歐洲北美那種大面積單一品種的原始植被，農業生產自然不適合單一作物大面積種植。王小強年輕時在陝北插隊種地，種什麼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倒春寒”毀了小麥，還有糜穀；洪水沖了川地，還有山地；“卡脖子旱”穀子欠收，還可以趕一季蕎麥；春天小麥套油菜，夏天玉米套豆角……分散細碎的地塊，高低不平的地形，變化多端的氣候，夏季集中的降雨，自然災害紛至遝來，多樣化的作物種植，加上深耕細耨、施肥倒茬、複種套種的複雜耕作制度，宏觀上需要大規模水利建設和救災賑濟，微觀上需要精細集約的個體家庭多種經營，不能像西方莊園（或村社）那樣粗放生產，通過莊園（或村社）內部的簡單分工，實現自給自足。³⁴

³³ 從公元前 2 世紀到 20 世紀 40 年代，2140 年中，中國歷史記載自然災害 5145 起。秦漢 340 年 375 次，三國和兩晉 200 年 304 次，隋 29 年 22 次，唐 289 年 493 次，五代 54 年 51 次，兩宋 487 年 874 次，明 276 年 1011 次，清 296 年 1121 次，民國 26 年 77 次。沒有記載的局部小災更是不計其數。參見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 1937 年，第 7~44 頁。

³⁴ “在公元前一世紀，種植的農作物包括禾、黍、春小麥、冬小麥、大豆、小豆、麻、瓜、瓠、芋、稗、水稻、蘇、芝麻、苜蓿與豌豆。使用的肥料除了綠肥外，還有人畜的糞便和綿羊、山羊、豬、牛、馬、家禽及蠶的排泄物。水分的供應已經能夠人工控制，水渠、陂池與水碓推動了從雨養農業向灌溉農業的轉變，促進了高度精細的集約農作體系的發展”。參見許倬雲：《漢代農業》，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第 147~148 頁。

歐洲地廣人稀，粗放輪耕，一塊地三年一熟。中國人口密集，精耕細作，一塊地一年兩熟、三熟。自然地理季風災害，形成中國特色的農業生產方式，一方面需要高度集中的政府協調，一方面需要高度分散的個體經營，從而造就反對大地主的獨特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³⁵就是到今天，農村包產到戶改革多年，即便實現了土地連片集中，在400毫米降雨線以內的主要地區，北美玉米帶式的大農場生產，照舊難以想像。由於必須格外操心的園藝型精細農業，中國既沒有經歷希臘羅馬式的典型奴隸制，也沒有經歷歐洲領主莊園式的典型封建社會。

農作的集約化，使整地、除草及不斷中耕成為中國農業的標誌性特徵，這意味著對每棵植株的精心照料幾乎已經達到了園藝式的水平（斯大林就很奇怪，中國人種地為什麼像繡花一樣精細——作者註）。農具種類的多樣化同樣表明了這些農活的重要性。這種農作方式更適宜小規模農作。同時，農民的積極性對於保證田間工作的精緻徹底非常關鍵，這也使得大規模使用農奴或雇工變得不大可靠。所有這些因素有助於解釋漢代自耕農的存在，以及大地主為何偏好出租土地，而不願使用農奴……農業集約化使很大一部分工作，包括除草、灌溉、施肥以及家內進行的工作，如澆種，都能由婦女與兒童完成。於是，小農家庭成為了一體化的生產單位。³⁶

中國的小農經濟，男耕女織的家庭多種經營，作為獨立經營單位，從來不能自給自足，必須依賴商品交換體外循環。只有魏晉南北朝長期戰亂，路面上不安全，商品交換全面萎縮，民間出現塢堡莊園，自

³⁵ 中國耕作技術的複雜，通常的解釋是人口增加，耕地有限，追求高產。深翻在歐洲是10~11世紀開始的事情，中國早熟在春秋之前。當時尚有大片南方土地沒有開發，人口壓力造就高產需求，顯然並非唯一解釋。適應氣候變化和災害風險，應當給以充分考慮。中國一年四季旱災有春旱、夏旱（掐脖子旱），秋旱；水災北方有洪水，南方有梅雨；低溫有寒潮，春霜，秋霜；風災北方有乾熱風，南方有颱風；再加冰雹、地震，各種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防不勝防。參見經濟地理研究室：《中國農業地理總論》，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28~37頁。

³⁶ 許倬雲：《漢代農業》第123~125頁。

給自足，在戰亂中以求自保。就在這段全面恢復自然經濟物物交換的時代，中國還出了魯褒強烈抨擊貨幣拜物教的《錢神論》哩。

“因此，農戶的生產會推動一種重商性農業經濟的發展，通過這種農業經濟，各種交易活動會循著一種樹狀結構展開，將若干分散的聚落（鄉村與城鎮）連接成一個市場貿易網。這種進行商業活動的農民涉足的地理範圍是相當廣泛的……城市、市鎮、小集市與路邊集市的的存在，表明交易點的層級網絡已經發展起來了……商業化可以將地區經濟連接成地域性的經濟網，並最終形成全國性的經濟網，而這反過來又會促進區域間生產的專門化……這是一個農業社會，然而卻是重商性的農業社會，它將個體農民結合在一個龐大的經濟網絡之中。”

“在司馬遷的時代，即大約公元前一世紀，有很多地方性的土產，粟，棗，橘，梓，漆，桑、麻，竹等等，這些產品在全國的市場都能買到……因此，這種情況完全不同於對古代中國農業社會的一般印象，後者認為它是由分散的、孤立的、自給自足的農戶構成的。”³⁷

“有貨幣存在的地方，就可以假定貿易和市場的存在。”³⁸ 比較古代社會商品交換的普及程度，幣材可以當成重要指標。西方古代商品交換多用金幣，³⁹ 中國從始至終廣泛使用銅錢，被韋伯

³⁷ 許倬雲：《漢代農業》第 148~149 頁。

³⁸ 卡爾·博蘭尼：〈經濟：制度化的過程〉，許寶強、渠敬東：《反市場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 年，第 48 頁。

³⁹ “由於一些至今無法解釋的原因，各日耳曼王國一直未能發展出一種購買力較低的銀制或銅制鑄幣”（羅伯特·福西耶：《劍橋插圖中世紀史》，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6 年，第 75 頁）。“拜占庭帝國一直使用金鑄幣，……受拜占庭或伊斯蘭的影響，西西里和西班牙偶而也發行金鑄幣。”隨著交換的普及，幣材逐步便宜。公元 800 年左右，查理大帝鑄銀幣，冠以鎊、先令、便士之稱。“佛羅倫薩在 1232 年開始採用自己的，更重的銀幣。……到 14 世紀末期，幾乎每個歐洲國家都在使用三種鑄幣——金，銀及銅或鎳等價值不大的金屬”（約翰·F.喬恩：《貨幣史》，商務印書館 2002 年，第 51~53、3、21 頁）。“金幣在羅馬時代已經使用，但中世紀西歐製造的第一枚金幣是熱那亞的熱那因（Genoin），鑄於 1252 年”（金德爾伯格：《西歐金融史》第 26 頁）。希臘、羅馬都有過地方性銅幣，因為行政區

當成中國商品交換不發達的證據。⁴⁰ 韋伯是現代社會學創始人，不瞭解古代，王莽所謂“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的道理。西方古代用貴金屬作幣材，交易對應的貨物，要麼是大宗買賣，要麼是與百姓無關的奢侈品。交換發生在國王與國王之間、諸侯與諸侯之間、莊園主與莊園主之間。而且，與貴金屬貨幣相聯繫的，經常是遠程貿易。“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就是銅錢，數量一多，也措不動。“銅適合於小筆零售交易，金子則適合於大規模的商業交易，而銀子則用於這兩者之間交易的收付。”以此推斷，西方古代用金幣進行商品交換，屬於少數上等人的事情。“他們的貨幣實際上沒有深入民間；即到近代，還有許多人終生沒有見過一次金幣。”直到 11 世紀十字軍東征，“西方基督教國家當時是農業社會，在這種社會裡，城市生活還是外來的生活，鑄幣還是很少見的通貨”。據此，恩格斯說，“貨幣在中世紀早期的典型封建經濟中幾乎沒有地位”。中國外圓內方的低價值銅製錢，是秦始皇統一的貨幣形式，兩千多年前開始，把民間百姓的商品交換，普及一粥一飯的程度。逢五逢十趕集，逢年過節廟會，大多在步行當天往返的距離。走街串巷的小販，路邊的茶館客棧，鐵器農具，油鹽醬醋，瓜果梨桃，針頭線腦，剃頭修腳，說書唱戲，普通百姓居家過日子，“孔方兄”須臾不能離。

“金、銀、銅、鐵鑄幣之間的比價，歷朝歷代相差懸殊，但大致的比價在 1 比 10 比 1000 比 10000 上下。”西方莊園主之間，

劃和度量衡不統一，“銅錢和旨銅錢通常只在發行它們的國家中流通”（牡丹：《古代世界經濟生活》，商務印書館 1966 年，第 159、215 頁）。

⁴⁰ 韋伯看到中國“銅依然是日常交易的通貨。西方貴金屬的廣大流通量，是史家所熟知的，尤其是漢朝的史家。”可是卻正題反用，一口咬定：“由於農業生產重於一切，是以貨幣經濟直到近代幾乎都比不上埃及托勒密王朝時的發展程度”（韋伯：《中國的宗教》第一章第一節）。試問，古埃及為托勒密修金字塔的廣大奴隸，哪位富裕得可以用金幣從事商品交易？

一單以金幣為等價物的商品交換，在中國小農家庭之間，足以分解成上千次用銅錢的小買賣，應當不難想像。由於貨幣深入人心，中國的信用發育特別早熟。漢武帝時的皮幣，具有信用性質。唐憲宗時的飛錢，被史家視為紙幣之濫觴。⁴¹ 馬可·波羅遊歷中國，深入西北大漠和西南邊陲，一路用元朝紙幣能否流通，判斷是否還在中國境內。⁴² 歐洲直到 16 世紀掠奪大量南美白銀，才在社會層面，推動以銀元為等價物的商品交換。⁴³ 等到西方興高采烈引進紙幣的時候，經歷過宋元幾朝的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當局對“劣幣驅逐良幣”的把戲心灰意冷，把紙幣當成玩剩下的垃圾了。

西方主導貨幣從金到銀、到銅、到紙，標誌商品交換從貴族到民間逐次普及。中國主導貨幣上手就是銅幣，接著是紙幣，然後是明清時代美洲白銀流入，促成商品經濟大發展的銅銀並行，從來不存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命題。⁴⁴ 有了廣泛商品交換的動力基礎——家庭經營的小農經濟，有了普遍交換的必要條件——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已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了。⁴⁵ 中國政府從成為政府那一天起，除了治水救災，治安收稅，主要的經濟職能，就是在宏觀上協調食貨關係。食與貨平起平坐，吃飯和交易並重。⁴⁶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湧現出

⁴¹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第 5 頁。不難理解，紙幣的採用，取決於信用和印刷技術兩個方面的發展。

⁴² 馬可波羅幾乎每到一地，均有或無“使用紙幣，臣屬大汗”一句，作為度量（譬如《馬可波羅行紀》（東方出版社 2007 年）第 471、473、475、477、478、481、483、484、486、498、501~503、505、507、512、515、517、520、523、526、546、547、549、557 頁）。

⁴³ 李錦章：《貨幣的力量》，商務印書館 2004 年，第 33 頁。

⁴⁴ “中國先人在世界上最早創造了在最多人口、最廣闊地域上，最長時間流通統一貨幣的歷史”（李錦章：《貨幣的力量》第 39 頁）。

⁴⁵ 《史記·貨殖列傳》。

⁴⁶ 歷史上，“食貨者，生民之本也”、“農商為國之根本，民之命脈也”、“無農則無食，無工則無用，無商則不給。三者缺一，則人莫能生也”等等農商為本的學術

管子、計然、李悝、白圭等一批宏觀經濟學家，明白“劣幣驅逐良幣”、⁴⁷ 谷賤傷農和經濟週期的道理，集中貨幣發行，設立貴賣賤買、農商兩利的平糶機制，已然是政府用公共開支，“逆風向”調節物價。西周《尚書》提出食貨範疇，《史記》專開〈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漢書》以後，歷朝官修正史多設〈食貨誌〉，專門研討國民經濟。宏觀經濟調節，產業與商業的關係，從古到今，都是中央政府經濟政策的核心內容。

黃仁宇不是大聲疾呼商業社會“數字化管理”嗎？中國的“商業社會”數字化管理震古爍今！

西漢的“算賦”、“口錢”和“算緡”使所有的國人不論大人小孩都必須用錢納稅；唐代的“兩税法”使各種稅項都要銅錢繳納；北宋王安石變法更是全面實行租稅貨幣化；明代“一條鞭法”將田賦、徭役、雜稅併為一條，折成銀兩，使租稅的貨幣化形式進一步深化。

需要補充說明，中國古代市場經濟發達，是小農經濟家庭經營的必要條件。多數傳統分析以為，男耕女織的大部分產品，生產的直接目的不是為了商品交換。這與歐洲資本主義發展，開局就是“羊吃人”，把農業生產大面積轉化為商品牧業生產，生產的目的明顯不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追求交換價值，不再是使用價值。然而，依據現代經濟學的邊際理論，無論男耕女織的商品率多麼低，只要生產者提供產品進入市場，市場價格必然成為所有產品或者消費或者出售的理性核算基礎。更何況，中國農村的商品率從來不低。史料大量記載絲織、棉花、茶葉、煙草、陶瓷、花卉、燒炭等產業，長期幾乎百分之百的專業化商品生產。美國人根據商業稅收推算，1077年，不

討論，史不絕書（吳松等：《中國農商關係思想史綱》，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
⁴⁷ 在西方貨幣史上，“托馬斯·格雷欣爵士（1519~1571年）是伊麗莎白女王的金融顧問，負責整頓女王父親的‘大貶值’所帶來的混亂局面，他還是皇家交易所的奠基者。他以格雷欣法則而著稱：劣幣驅逐良幣”（約翰·F.喬恩：《貨幣史》第24頁）。

算就近集市貿易，全國農業總值的 20~30% 進入長途販運。⁴⁸ 更何況，當年英倫一隅“羊吃人”，也不是糧食統統進口哩。

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達的程度，遠遠超出轉軌經濟學家們的通常理解。布羅代爾甚至把市場經濟過分普及，當成“中國資本主義未能發展起來的重大原因。”⁴⁹ 許倬雲甚至把發達的市場網絡，當成中國得以大一統的經濟原因。“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必有市場經濟配合發展……從漢代開始直到清代，全國性的市場網絡一直存在……西歐缺乏精耕細作的傳統，長期處於粗放的農業狀態。粗放的農業與畜牧業經常配合。因此土地的所有形態也與小農私有制不同。同時，西歐的製造業大致以城市作坊經營；因此，西歐以城市為經濟中心發展為地區性經濟網絡，而無須全國性的農村交換網。這方面的差異也許是中國要趨向統一的重要因素。舉例言之，南北朝交界的地區經常是走私來往之地，駐守的軍隊也可能與對方軍隊互市。南北朝時如此，宋遼對立時如此，宋金對立時也是如此。甚至最近海峽兩岸還是有切不斷的交換與貿易。在交換網籠罩下，政治的分裂不能改變雙方互相依附，利益互通，以至物質上不斷地交流。於是中國在長期發展下一定出現交換網的形態。這是王小強在經濟形態方面的解釋，說明中國分裂之後，又回到統一的緣故之一……唐宋以來，第一級地方行政單位是道和路；顧名思義，道和路應當與交通網絡有關，也與經濟地理上資源交換與流轉有關。但是在全國性整體的經濟網絡之下，沒有一個道和路可以充分掌握資源……行省不成自然單元，疆吏即難以割據自雄”。⁵⁰

各省的富饒特產以及通過河流與大運河運送商品的能力，使

⁴⁸ 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三聯書店 1997 年，第 18~19 頁。布羅代爾這話說得草率了。世界上哪有不用動脈、靜脈的毛細血管流通？

⁴⁹ 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2 年，第 24~25、29~30 頁。

⁵⁰ 許倬雲：《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第 24~25、29~30 頁。

得帝國總是保持繁榮昌盛……中國境內展開的貿易活動規模如此盛大，整個歐洲都望塵莫及。

有識之士已經指出，世界任何地方的商業繁榮都比不上中國。

正如我們對亞洲參與世界經濟的情況的考察所表明的，不僅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東方專制主義，而且那些所謂的亞洲非理性和反對追逐利潤的特徵以及前商業和產業資本主義的種種說法，都是不著邊際的無的放矢。歷史上，亞洲的經濟和金融發展及相關制度不僅達到了歐洲標準，而且在兩千多年前就超過了歐洲，在 1750 年時依然超過歐洲，甚至到 1800 年還高於歐洲。

西方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認識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王小強的分析震古鑠今，振聾發聵，但矯枉過正，過猶不及。其實，各自的傳統文化，都有其產生的複雜條件，誰也不用輕賤誰。

世界歷史這五百年，是西方稱王稱霸全世界的五百年，西方的學術，西方的心理，西方的制度建設，乃至一切都離不開其赫赫武功。西方的軍事傳統，特點是崇尚實力，崇尚殺人技術，崇尚大規模的殺戮和報復。西方現在愛講全球化，戰爭是最大的全球化，真正的“球之大事”。古代是草原民族的騎兵部隊最厲害，不用後勤補給，走到哪搶到哪，甚至對人“飢餐”，“渴飲”，非常殘酷，但又是對文明帶來的腐敗的大掃除。西方傳統的對外掠奪和殺人技術，與草原民族，庶幾近之，它繼承了草原民族戰爭的殘酷和獸性，傳播的是西方文明的極樂世界。歐洲兵法的黃金時代是在拿破侖戰爭之後，它是西方極樂世界的頂峰。直接後果是剛剛過去的 20 世紀人類打了兩次世界大戰，西方人的自私、傲慢與偏見，幾乎毀滅這個星球。